

**“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 ——  
法西斯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讨论集**

**(2017年1月至4月)**

## 目录

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	2
特朗普比波拿巴更加“小丑”，美帝国主义比“第二帝国”更加虚弱.....	12
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19
法西斯又来了？——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	30
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	42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不乐观，却很盲目.....	50
再论法西斯——“泥足巨人”如何才能被击倒？.....	53
同志，咱们聊聊怎么给资本主义挖坟.....	68
面对法西斯，决不可掉以轻心.....	82
从纳粹德国的“经济奇迹”看法西斯主义挽救不了资本主义.....	85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不要害怕法西斯.....	96

## 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

张跃然/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一刻起，许多舆论就将这一事件戏称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人们热衷于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称《雾月十八》）中的只言片语透视美国大选，指出波拿巴复辟与特朗普上台之间的相似性。

然而，这其中的大多数分析往往流于表面。

作为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论述之一，《雾月十八》中蕴藏的洞见是复杂而深刻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如何从《雾月十八》的论述中，提炼出具有生命力的概念、视角和分析思路？这些思想资源，究竟如何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上台这一事件背后的美国政治整体走向？

### 《雾月十八》写了什么？

1848年，法国人推翻了七月王朝的专制政权，建立第二共和国，但只维持了短短三年。“雾月十八日”指的是1799年11月9日（法兰西共和国历的雾月十八日），是拿破仑发动政变的日子，法国大革命就此终结。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的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发动政变、终结第二共和国、最终走向君主专制复辟，重演法国大革命的结局。

历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起源于激进思想的1848法国革命，在短短三年之后就走到了君权复辟的结局？这是马克思写作《雾月十八》时试图回答的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答案就在各个阶级的政治互动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小规模生产者）、无产阶级、小农、流氓无产者（没有正式营生的社会边缘人）在马克思笔下一一登上政治舞台，展开复杂的交锋。

在各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了七月王朝之后，无产阶级首先发现，如果不采取极端行动，新的共和国政权势必被资产阶级主导。无产阶级发动“六月起义”，但最终失败，从此被逐出了政治舞台。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制定过程，被资产阶级中“共和派”所控制的立宪议会牢牢掌握。

1848年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并获得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波拿巴的暗中帮助下，直接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通过一系列行动，以“立法议会”取代了之前的立宪议会，将政治主导权从“共和派”手中夺了过来。在夺取了政治主导权之后，秩序党却在议会内外受到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挑战。通过武力镇压、撤销普选权等一系列斗争手段，秩序党最终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能量。

在此刻，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看起来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然而，之前一直被看做秩序党盟友的波拿巴却开始露出尖牙厉爪，一步步巩固自身权力。这样一来，作为总统的波拿巴与秩序党所控制的议会开始直接交锋。波拿巴不仅成功地将流氓无产者动员起来，还坐拥小农的支持。更不幸的是，大资产阶级也背叛了原本代表他们利益的秩序党，倒戈向波拿巴。这种形势下，秩序党议会在波拿巴的步步挑衅面前无所适从、步步退缩。最终，波拿巴成功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1848宪法，第二共和国宣告终结。

## 波拿巴的上位之路

在这段故事中，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深思：对于各股政治力量，我们都能指出其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但波拿巴是个例外——他走上政治舞台，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而是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左右逢源，策略性地在特定时刻争取特定阶级的支持。

为什么偏偏是没有阶级代表性、只有个人利益的波拿巴，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个问题，又可以被切分为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为什么波拿巴能当选总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厘清总统选举这一政治过程的性质，尤其是要明白：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是根本不同的。

《雾月十八》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每位议员只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或地区、甚至仅仅代表了凑够七百五十这个数字的要求，而总统是由全体国民选出来的，总统选举是作为主权行使者的人民每四年便运用一次的王牌。国民议会和国民的关系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总统和国民的关系却是个人化的、具体的。议会中的议员们代表着国民精神的各个不同方面，但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实在化身。和议会相比，总统拥有某种近似于神权的权利；他之所以成为总统，是因为人民的恩赐。”*

议会中的议员，代表着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但总统却代表着“全体人民”来掌握国家机器。选举总统，是选出一个人作为全体国民的符号象征。换句话说，在总统选举中，“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和利益”从一开始就不是其原则或目的。总统是“国家整体”的代表，因此总统候选人需要声称自己代表广泛的“人民”，而避免给选民留下“某个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印象——正因为波拿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才能承载着跨阶级的政治支持而当选总统。

今天的总统选举，也往往体现出这种特点。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宣称自己代表某种普适意义上“人民”的声音，而不是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的传声筒。他们背后的选民构成，也的确十分多样。支持特朗普的群体，囊括了宗教保守势力、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本。而支持希拉里的群体，涵盖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城市穷人、工会、职业中产阶级和一部分新兴资本。

总统选举的这种特点，早在波拿巴时代就已经显示出来。

但要理解波拿巴为何能成功复辟，必须考虑另一个问题：波拿巴为什么能成功击垮议会、彻底打碎议会的政治制衡？

最直接的解释是，由秩序党控制的议会过于软弱，在波拿巴一步步向议会进攻的过程中一味退让。但我们需要追问：议会为何表现得如此软弱？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议会作为代议制民主机构的内在问题。

在议会和波拿巴对峙的时期，秩序党议员们要想捍卫自身的政治利益、扩大手中的权力，就需要保卫议会制度、与波拿巴对抗。然而秩序党背后的大资本家们，却出于对政治稳定

下赚钱做生意的渴求、对强大国家机器的依赖、和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因（后文详述），选择了支持波拿巴。于是，议会中的秩序党人作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出现明显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代表性危机。

在代表性危机之下，这些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就顺从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向波拿巴投降；要么就彻底地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与波拿巴斗争，这就要求秩序党人跳出“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框架，转而去寻求其他阶级作为民意基础，或者打造一种无关于阶级的民意基础。但秩序党议员们的实际做法却是，一直在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名义上的“阶级代表性”之间挣扎，在波拿巴的步步紧逼之下无所适从，最终也被其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彻底抛弃。

### 今天的代议制民主，已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秩序党议会的垮台，实际上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机制的一种内在缺陷。

在通俗理解中，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各个社会群体选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些政治代表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传声筒，参与政治决策。代议制民主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基于这样一种预设：政治代表在参与政治时，是依照其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行事的。

但实际上，代议制民主机制选举出的政治代表，并不是其代表的选民群体控制的木偶，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个体。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其理论上应该代表的选民群体的利益。

理论上讲，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分化，政客需要在个人利益与其代表的选民利益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但是在现实中，总有某些具体的议题上，政客个人利益与选民利益无法被统一，导致政客的私人立场和他理论上代表的群体立场出现直接矛盾，成为可见的代表性危机（正如秩序党和大资产阶级在是否支持波拿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那样）。

当代表性危机出现时，政客们若想在代议制民主的游戏中不被淘汰出局（或者说，不犯下秩序党议员的错误），就必须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坐标，模糊他们原有的代表性。这种模糊化的努力，往往需要政客们停止宣称自己代表着某个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而通过寻找新议题、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等方式，将自身包装成某种广泛利益诉求的代表、打

造某种包含多个选民群体的庞大支持基础。因为一个政客所宣称代表的选民群体越单一，其自身利益与该选民群体利益之间的分化就越容易被察觉，丧失该群体支持对政客自身政治利益的影响也越致命，秩序党就是前车之鉴。

代议制民主之下政治代表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不仅体现在个体政客身上，也体现在政党身上。新近的一些政治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党不是被动代表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新的利益诉求、身份认同、群体分界。更有甚者，政党也会通过话语宣传、政策收买等手段，积极收编浮现的新社会思潮，将具备潜在革命性的新认同扼杀在萌芽中（比如美国民主党对独立劳工运动的收编）。同时，当代议会制度也给政客提供了足够空间（比如在不同选区之间、两院之间、乃至议会与行政机构之间切换）去模糊自身的代表性、创造性地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

这样看来，代议制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代表性”的政治。我们很难把当今某政客或政党的支持群体，归纳成某个具有清晰身份和诉求的社会群体，更无法将该政客或政党看作这一群体实际上的政治代表。政客和政党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实会在特定情境下选择性地回应特定群体的诉求，但他们本身不以“特定群体的政治代表”身份参与政治决策。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国家原本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最终扩大或转换了自己的选民基础（比如英国工党和加拿大新民主党）；以及，为什么许多国家出现了纯粹以吸引最多选民为己任的“囊括型政党”（catch-all party，既包括一些没有清晰政治立场、纯靠历史上遗留的动员结构来吸住选民的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包括有清晰立场、但希望用自身立场广泛讨好选民的党——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

如此解读《雾月十八》，我们可以看到：总统选举本就不以代表性为原则，而代议制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代表性政治的意涵。因此，对“某某政客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分析，可能已经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我们恐怕不能将支持特朗普的群体看作是他实际上代表的群体，特朗普也不必然会回应某个支持他的群体的利益诉求。

## 如何超越选举政治

马克思对于选举政治的态度是辩证的。

一方面，无论是在早期著作《法哲学批判》还是晚期著作《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都肯定了选举作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对《雾月十八》的以上解读，选举制度的框架本身，很难实现政客对选民的有效代表，它提供的是一种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民主”。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去弥补选举政治的内在缺陷呢？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制度设计，使选民有渠道对他们选出来的政治代表进行更直接的问责。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模版，提出了一种他认为相对理想的民主制度。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民有权随时通过投票来解雇他们选出的政治代表，而不需要等到几年一度的选举时另选他人。

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运动式的。在《雾月十八》中，曾经有两个阶级面临其阶级利益与代表本阶级的政客个人利益明显脱节的状况，但结果却完全不同。

一边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性危机。起初，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立宪议会中的“共和派”，但大资本很快发现“共和派”不能有效代表本阶级的现实利益诉求（维护政治稳定），因此他们转而支持秩序党，作为更加直接的政治代表。再到后来，大资本发现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与秩序党成员的个人政治利益出现分化，于是转而支持波拿巴。

另一边，工人阶级也在遭遇代表性危机。在“六月起义”之后，工人阶级自身已经不可能拥有独立政治代表了，只能将社会民主党作为政治代表，但当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向秩序党妥协的时候，工人阶级只能听之任之。

在“六月起义”的沉重打击之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能力羸弱，使得他们没有能力要求“名义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向自己负责。与之相反，大资本的政治动员能力强，因此在出现代表性危机时，能够果断更换新的政治代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动员能力不同，因此对政客施加影响和问责的能力也不同。动员能力强大的群体，有能力切实影响到政客的个人利益与政治前途、迫使任何政客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不管这些政客名义上代表着谁。

换句话说，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事实上都不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时，特定群体要想让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中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坐等着“被代表”，而必须在选举政治之外、在社会当中，培育草根动员力量，自下而上地壮大自身的政治行动力，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写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街头”。



这也呼应了左翼思想家墨菲（Chantal Mouffe）（编注：墨菲，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就必须既以政党的形式参与选举政治，又培育独立而活跃的草根运动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在选举政治中夺取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运动强大，才能尽可能保证左翼政党在夺权之后不“变质”、真正实现对左翼诉求的代表。

## 神合貌离的资产阶级与国家权力

《雾月十八》的故事中，还有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为什么最终在“由自己的政治代表统治”和“由波拿巴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诚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更能维护个体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考量之下，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对资产阶级而言，“由自己的政治代表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统治”，会让国家政权带有极为可见的阶级统治色彩，这种可见性，很容易为被压迫阶级所察觉，使得被压迫阶级在脑海中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统治画上等号。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任何执政失误，都将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整体的责任；任何反抗国家权力的斗争，都有可能蔓延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将不得安宁：国家权力运作中生产的任何不满，都可以迅速转化成反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而波拿巴的好处在于，他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资产阶级，而且坐拥小农、流氓无产者等多个群体的支持。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动员能力向波拿巴暗中施压、迫使其回应资本的利益，但因为波拿巴政权不会被人们看作是资产阶级政权，所以波拿巴执政的问题，就不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反抗波拿巴专制的斗争，也很难演化出反抗资产阶级的诉求。这样一来，不管国家政权面对怎样的挑战、不论政权怎样更迭，资产阶级的结构性特权并不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波拿巴政权的最终垮台，也没有改变法国的阶级格局。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政治学家米利班德（Ralph Milliband）认为，资产阶级精英把国家机器攥在手里，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他的论敌 Nicos Poulantzas 指出，国家机器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中的个体资本家和派系，这种独立性使得国家能够调和不同资产阶级派系的冲突、维护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但从《雾月十

八》的分析来看，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安排其实是：让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维持形式上的距离，以使得国家既不会被视作个别资产阶级精英进行统治的工具，也不会被视作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言人。

这样一来，虽然资产阶级还是能在相当程度上干预国家行为，但人们难以在意识层面将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这种迷惑性的距离，最有助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长期稳定。当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强调自身的个人利益、或是将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纳入其执政的民意基础时，实际上是维护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形式上的距离。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的所作所为。特朗普胜选以后，史无前例地将多位资本家和大公司领导人任命到内阁的关键职位上，被称为“史上最富内阁”。在国务卿、教育部长、劳工部长、陆军部长这种一般由职业政客担任的内阁职务上，特朗普分别任命了埃克森美孚公司 CEO、温奎斯特投资集团创始人、CKE 餐饮公司 CEO、高频交易巨头 Virtu Financial 创始人。很多人指出，这种明目张胆地将资本力量引入政治舞台的做法，和特朗普竞选时摆出的民粹主义反精英姿态相比，是十足的虚伪。但我们更要看到，后者恰恰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之一。

恰恰是因为特朗普的反精英姿态、因为他坐拥大量中下层选民的支持、因为他和共和党建制派的紧张关系，使得他在大量选民的心目中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他对于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攻击，一直围绕着“建制精英和资本的密切关系”这一主题，也就暗示了自己是不会陷入这种关系当中的。特朗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说服选民无视“他自身是资本家”这一事实、而认为他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是利用“他自身是资本家”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说服（“我已经足够有钱了，所以不会被任何人收买”）。正是因为特朗普在观感上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距离，才使得他能在不招致严重反弹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提供更直接、强力的渠道介入国家政治。

执政者与资产阶级在观感上的距离越大，资产阶级事实上的政治活动空间也就越大。试想，任何一个建制出身的总统候选人，难免被人怀疑与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暗中联系（比如希拉里），一旦在内阁中任命大量资本家，很容易被广泛指责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但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坚定反资本、反精英姿态，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所以就算他事实上做出一系列亲资本举动，也有大量选民坚信他不会沦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类似，如果特朗普政权今后在执政中出现任何问题，这种迷惑性的距离，会让很多人不把这些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而看作是特朗普个人作为野心家的问题、或者是右翼民粹主义路线的问题。

在波拿巴和特朗普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个阶级将执政者和国家机器玩弄于股掌之中，也不是国家高高在上地统治、调和各个阶级。相反，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维持了足够的形式上的距离，实际上却是相互依附的关系；恰恰是形式上的距离，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紧密、更加安全。

## 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悖论

从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出发，我们最终需要反思国家机器本身。

波拿巴一步步完成复辟的过程，也是他作为总统所掌控的官僚国家机器一步步扩大自身权力、摆脱议会约束的过程。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指出：一个相对自主的官僚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扩大国家机器的权力，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最高利益（虽然国家机器成员内部也会出现利益分化）。

这个相对自主的国家机器，很大一部分是运转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而在马克思看来，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很容易变成巨大的反动力量。如果不直接将国家机器本身民主化，这种反动的可能性就无法消除。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暴露了它的局限：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将议会这个理论上直接向选民负责的代议制民主机构，与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僚制国家机器区隔开来，从而不让民主的力量进入国家权力日常运行的内部。随着掌握实质性权力的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理论上代表民主意志的议会如果无法有效制约国家机器，必将沦为无关紧要的“辩论俱乐部”。

在特朗普正式就任的时刻，我们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没人知道这个疯子会做什么”的担忧蔓延开来。作为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的最高掌控者，他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为所欲为”的能力。而从根本上说，这种不确定性是近数十年来美国行政权力不断加强、立法机构的制约作用不断弱化、官僚国家机器的规模和自主性不断扩大的制度后果。

在理想的状态下，特朗普即便是作为总统，也理应没有能力去改变美国民主的权力制衡，然而事实上他却有，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日益失效、议会越来越沦为“辩论俱乐部”的基础上的。

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波拿巴，成功击垮了代议制民主、实现君权复辟；而同样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特朗普，也不断表现出进一步绕过、甚至突破民主机制限制的迹象。

马克思会认为，这其实暴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深刻悖论：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民主方式维持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但民主机制不可避免地留出了被压迫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的空间。通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被压迫阶级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为资产阶级制造麻烦，甚至孕育出更激进的抗争可能性。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身权力，会撤回到反民主的路线上。

在 1848 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反民主路线体现为明目张胆地剥夺普选权等民主权利，以及最终支持波拿巴的君权复辟。而到了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出了更加复杂而间接的反民主策略，它不需要简单粗暴地破坏民主，而是通过代表性政治的消解、国家机器自主性的强化等方式，将民主制度虚化、掏空。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描述的，从民主共和国到君权复辟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虽然调适的结果，也许超出资产阶级最初的预料。而特朗普的上台，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雾月十八》提醒我们，这种政治调适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外，而恰恰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趋势当中。而当这种调适发生时，那些用来支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能抵御调适带来的政治后果。

（原载《墙外楼》，2017 年 1 月 23 日）

## 特朗普比波拿巴更加“小丑”，美帝国主义比“第二帝国”更加虚弱

### “红海军”

近来经常听到张跃然同学的大名，但是以往一直没有和他交流过。近日读到网上流传的张跃然的新作，“马克思的《雾月十八》如何帮我们理解当代美国政治”；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了法国十九世纪中叶的阶级斗争，比较了路易·波拿巴和特朗普上台的某些相似性，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描述的，从民主共和国到君权复辟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虽然调适的结果，也许超出资产阶级最初的预料。而特朗普的上台，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

也就是说，特朗普上台，与当初波拿巴在法国上台一样，本质上并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更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而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一切都在资产阶级的掌控之下，即使表面上是出乎资产阶级“预料”，乃至至于抛弃了资产阶级的直接“政治代表”，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但不动摇，反而更加巩固，“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维持了足够的形式上的距离，实际上却是相互依附的关系；恰恰是形式上的距离，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紧密、更加安全。”

透过张同学的旁征博引、满纸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话语，唯一留下来的印象，便是无产阶级的无力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强大。无产阶级搞武装斗争，可以镇压下去；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参加选举政治，资产阶级照样可以玩弄无产阶级于股掌之中；两者都不起作用了，资产阶级的武器库中仍然可以拿出数不胜数的、眼花缭乱的“政治调适”手段平安渡过。如此说来，社会变革的动力和希望到底在哪里呢？

至于张同学援引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墨菲的观点：“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就必须既以政党的形式参与选举政治，又培育独立而活跃的草根运动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在选举政治中夺取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运动强大，才能尽可能保证左翼政党在夺权之后不‘变质’、真正实现对左翼诉求的代表。”这难道不正是西方的进步社会运动（以及受西方影响的拉丁美洲、南亚等地社会运动）自 1968 年以来几十年的实践吗？几十年了，这个世界是更加光明了，还是更加黑暗了呢？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灵丹妙药，有什么“神的启示”，可以让我们相信，几十年来越走越窄的“草根+选举”的死路突然就变得道路畅通、前途光明呢？

### 美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的不朽篇章，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可以从其中汲取营养，获得启发和鼓舞。但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毕竟不同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的阶级斗争形势；1848-1852 年的世界历史条件也迥然不同于 2008 年以后的世界历史条件。与其削足适履，硬要在波拿巴和特朗普之间寻找一些形似而不神似的相似点，倒不如扎扎实实地分析一下现实的资本主义矛盾及其对阶级斗争的影响。

概括地说，笔者认为，特朗普上台，并非什么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的“自我调适”，更不会使得资本主义“更加紧密、更加安全”，而是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深刻危机的表现，并将反过来加深这一危机。这一危机发展的结果，虽然在短期内并不会造成美国无产阶级革命，但却一定会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

在上世纪中期，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是比较稳固的。当时，不仅美国霸权在世界上如日中天，美国资本家垄断着世界工业；在美国内部，通过“新政”等一系列社会改良，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分享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红利”。通过对工人阶级的有限让利，美国资产阶级换取了工人阶级和工会官僚在政治上放弃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目标，形成了阶级妥协的“黄金时代”。

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半期，这一套“资本-劳工谅解”就已经开始瓦解。由于工人阶级力量上升，工人斗争加强，威胁到了资本家的利润率，并造成了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的积累危机。当时，除了日益高涨的工人斗争以外，还有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环境运动等，一度使得美国资产阶级统治发生动摇。为了应对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美国资产阶级经过尼克松、卡特两个选举周期的调整，以里根上台为标志，向工人阶级发动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始（在此之前，七十年代，智利、中国、英国，已经分别发生了对新自由主义有利的政治变化；美联储已经开始实行对新自由主义至关重要的紧缩货币政策）。

美国资产阶级要打垮工人阶级，克服积累危机，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有个过程的。对外，需要有一块新的地理区域，有一支庞大的廉价劳动力队伍，便于跨国资本大规模转移，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这个地理区域，是由东亚地区来提供的。对内，美国资产阶级还受到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限制。更根本的原因是，美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霸权国家，如果发生重大的政治不稳定，不仅会动摇美国资本主义，更会严重动摇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不到万不得已，资产阶级是不能冒这个风险的。

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虽然美国工人阶级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实际工资长期停滞、下降，但是总的来说，美国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冲击远远小于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地区人民所蒙受的巨大灾难。在世界范围，美国工人阶级实际上还在分享着美帝国主义剥削全世界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到了九十年代后半期，一度形成了某种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妥协：一方面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和硅谷高技术资本暴富，同时附庸于这些大资本家的一部分上层中产阶级（即现代“小资产阶级”，如经理、计算机工程师、金融分析师等）也在相当程度上受益。至于美国工人阶级，也通过借债消费、借债买房，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新自由主义的相对“繁荣”。在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的同时，美国工人阶级通过消费大量来自中国、越南、孟加拉、印度、墨西哥等地的廉价消费品，间接地分到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杯羹。

但是，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妥协”格局，在 2008-2009 年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以后就完全破裂了。即使是以借债或者“金融创新”的方式，美国资本主义也无法将工人阶级容纳在自身的社会妥协范围内。大批原来社会地位处于“中等”的工人阶级家庭陷入绝望，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而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条件下，由此而形成的阶级矛盾激化在短期内又不可能造成积极的、革命性的变化。

### **美国的工人阶级和“进步”社会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著名的“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设想。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比马克思所设想的要复杂。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为止，无产阶级化的进程主要限于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地位的一部分西方国家。由于世界范围的剩余价值高度集中在少数西方国家，这就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将所掌握的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拿出来，进行一定范围的社会改良，并逐渐消蚀西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而不是从话语、文化领导权等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这是西方工人阶级自十九世纪末期以来逐步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即使是今天，相对于亚非拉的广大劳动群众，美国工人阶级（更不必说小资产阶级）仍然享有巨大的物质特权。在许多美国工人看来，从他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直接生活经验出发，改善他们物质生活条件最直接、最便利的方法，不是社会革命，而是恢复他们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地位；而要恢复他们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垄断地位，就要把被少数族裔“抢走”的工作岗位抢回来，就要把移民工人挡在外面，就要沿着美国边界建起一堵墙。这部分工人阶级，是特朗普的主要选民基础。

另一方面，美国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进步”社会运动，早已经与工人阶级渐行渐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对于此后相当一个时期世界范围进步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的“进步”运动也在相当程度上起了变化。一部分六十年代的积极分子，被民主党收编，变成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操纵小资产阶级和底层工人阶级的职业政客。争取妇女解放、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逐步堕落为“身份政治”。这种“身份政治”，一方面反映了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一部分新形成的小资产阶级要求资产阶级扩大其对小资产阶级的容纳范围、为新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往往是来自女性和少数族裔）提供相应的经济和政治特权的要求（有点类似于中国的自由派分子向共产党要“民主”但实际上丝毫不关心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迎合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资产阶级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一方面向有廉价劳动力的地区资本转移，另一方面直接从外国（如墨西哥）引进廉价劳动力，并将现有的尚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

在美国现有的阶级斗争条件下，无论是工人阶级企图恢复“黄金时代”的徒劳努力，还是以小资产阶级为主（并且裹挟一部分底层劳动群众）的“进步”运动，当然都不可能带来积极的社会变革。但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造成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混乱，并且随着美国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得资产阶级丧失有效解决自身政治问题的能力。

在 2016 年大选中，特朗普上台，这不仅是完全出乎美国资产阶级预料的，而且是美国资产阶级对政治过程失控的结果。特朗普本身是个大资本家，他的“内阁”也将由许多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将军们组成。但是，这个“内阁”是否还有能力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而不仅仅是一部分资本家的眼前利益，则是大可疑问的，也是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报纸所忧心如焚的。

如果说，路易·波拿巴还是一个真实的资产阶级将军，掌握着实际的军事力量，头上还戴着伯父“第一帝国”的光环；那么，特朗普，就完全是一个政治小丑，其背后，本来没有任何真实的社会力量的。但是，在美国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特朗普使得美国资产阶级

内部原有的妥协格局和游戏规则被严重破坏了，将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矛盾公开暴露出来。这样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厮杀，除了使美国资本主义陷入混乱以外，有可能在长远为世界范围的进步变革创造有利条件。

比如，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资产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和硅谷高技术集团。这部分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在于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对外，一方面继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保持对中东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实行一些有秩序的战略退却；对内，则为了收买小资产阶级以及扩大来自底层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愿意在种族、性别等方面实行一些较为“进步”的社会政策。

特朗普政府到底将实行什么政策，他想要实行的哪些政策又能够真正地实行下去，还有待观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一部分制造业资本家的压力下，特朗普可能实行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特朗普可能实行一定的限制移民的政策。这两项政策，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客观上都会起到瓦解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作用。在能源工业资本家的压力下，特朗普已经决定要全面解除环境方面的管制。在短期，这当然会大大加重世界环境危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未尝不可以对环境保护积极分子起到教育的作用，用现实的经验来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克服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在世界范围，在不同资本家集团的矛盾斗争中，特朗普既可能卷入新的军事冒险，也可能在事实上实行全面的战略收缩；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导致美帝国主义加速衰落，从而有利于世界人民的进步斗争。

十九世纪的法国，阶级斗争虽然激烈，却仍然处于欧洲和全球资本主义的上升时代；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固然绝望，资产阶级的前途也不光明，无论美国和全球的资本主义都已经走上了衰亡的不归路。在这个意义上，如今的美帝国主义其实比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纸房子”更加虚弱。

## 世界的希望在东方

作为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或者进步分子，我们要把主要的工作精力用于中国人民的事业。这不是由于我们在精神上狭隘，而是由当前世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美国和西方的工人阶级不大可能主动地完成他们那里的革命变革。拉丁美洲、南亚、俄罗斯等地方的进步斗争也有各种各样的暂时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在世界的东方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这个地方的无产阶级已经壮大，并且其力量将逐步增强到资产阶级无法简单用镇压的方法来摧毁的地步。另一方面，这个地方的资产阶级虽然貌似“强大”，实际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所拥有的有限的剩余价值不足以将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完全收买下来。这样，在世界历史上，就第一次出现了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几乎完全吻合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东方的无产阶级将用自己的伟大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人民指明道路。

（原载《红旗太平洋》2017年1月25日）

## 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张跃然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它的兴起背后有着怎样的根源？这一问题，在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形势下，越发显出格外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往往用两种方式解释法西斯主义的起源。一种认为，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在进行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为了在全球市场中与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抗衡，有可能转向一种极端的政体形态来动员生产，因此走向法西斯主义。另一种解释则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爆发的表现，说明了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到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地步，法西斯主义必然崩溃，顺便把资本主义一并埋葬了——这一观点在 1920-30 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组织（尤其是第三国际）中格外流行。

这两种解释貌似针锋相对，但根本上都是「经济决定论」，或者说「生产力决定论」。这种将政治现象简单归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解释框架，不仅在概念上显得机械而缺乏美感，更与基本史实相悖——在二十世纪初，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并不是都先进或都落后。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否还能为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尼科斯 - 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于 1970 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与专制》一书，通过分析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给出了一个极富洞见的答案。

普兰查斯希望，既能守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又能去除掉其中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共产党宣言》的那句名言——「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成了他分析框架的出发点。在普兰查斯看来，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当然是重要的，

但它们并不能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而是创造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各个阶级。

历史发展的进程，取决于各个阶级在政治舞台和意识形态场域的斗争结果。阶级斗争的过程虽然被经济结构所影响，但本质上有着独立的政治逻辑。因此，普兰查斯认为，要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要回到德国和意大利的阶级斗争过程，仔细考察各个阶级的政治状态。

法西斯主义，根本上源自于阶级斗争所导致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危机。

### **法西斯主义的时代背景**

要解释阶级斗争过程怎样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首先需要明确德、意两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全球性时代背景之中。这一时代背景，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向帝国主义形态的过渡。

用列宁的话说，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代表着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集中，自由竞争式资本主义势必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本国的垄断资本想要继续壮大，需要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保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市场，这使得海外殖民主义扩张成为必然。

而普兰查斯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势必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国家需要转变角色和组织方式，使自身能够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因此，资本主义国家逐渐从「自由放任式国家」向「积极干预式国家」转型，国家的主导权逐渐从议会向官僚国家机器转移。

这种转变当然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依然是阶级斗争：大型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攻克中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抵抗，才能成功转变国家形态，从政治上加速中等资本家的灭亡。

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背后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型」的大背景，也体现了这个过程中的一般趋势和内在矛盾。

但是，在欧洲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向帝国主义转型的过程中，为何偏偏是德国和意大利倒向了法西斯主义？这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走向帝国主义阶段的同时，都面临着同一个悖论：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不匹配。

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开始得晚，但速度很快，在二十世纪初期，德国已跃升为生产力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资产阶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强势与其在政治上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出于对工人阶级的忌惮，德国资产阶级并未主导民主革命的进程；恰恰相反，德国的民主化和统一是由俾斯麦领导的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推动的。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不得受制于地主阶级的强大政治影响力。政治弱势的资产阶级，无法有效掌控国家机器、使其为自身的经济利益服务。

意大利的局面恰恰相反。二十世纪初期，意大利的工业化进程极度滞后，虽然金融资本已经崛起，但因为工业资本主义不发达，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大部分依然是停留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农业。然而，意大利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弱势与其在政治上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资产阶级抓住了底层民粹主义运动提供的机会，主导了民主化和统一进程，最终掌握国家的政治主导权。然而，为了安抚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承诺不进行任何农业改革。这样一来，意大利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经济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 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形态过渡的进程，也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崛起的过程。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特殊局势，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严重地激化了各个统治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首先，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与地主阶级的利益产生深刻冲突。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希望破除地主阶级的政治主导权，使得国家权力真正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在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希望能撤回之前对地主阶级做出的妥协，真正开启农业资本化改革。

其次，垄断资产阶级的崛起，严重威胁了中等资产阶级的生存。一旦垄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施行一系列服务于垄断资本发展的政策，那么中等资本难逃被兼并、淘汰的命运。因此，中等资产阶级尝试从政治上压制垄断资产阶级的发展。为了实现这种压制，中等资产阶级选择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奉行「阶级和解」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权益，以共同对抗垄断资本。

这种「阶级和解」路线，自然是垄断资产阶级所无法接受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将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强度上、废除工人阶级已经取得的权益。对工人阶级的不同立场，也进一步激化了垄断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矛盾。

换句话说，正在崛起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希望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全面建立领导权，但遭到了其他统治阶级——尤其是中等资产阶级——的激烈抵抗。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造成巨大的政治危机。

这一政治危机有两种具体的表现。

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危机。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建立过全面的领导权，因此他们也未能在各自国家建构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

态。他们所奉行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封建意识形态残余、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各元素的奇怪混合体。而崛起中的垄断资产阶级，则试图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取而代之，招致其他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强烈反对。这样一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陷入彻底的混乱。

二是政党组织层面的危机。在争夺政治主导权的过程中，各个统治阶级越来越与原先代表各自阶级利益的传统政党脱节。无论是垄断资产阶级还是中等资产阶级，越来越倾向于绕过政党、通过更加直接的组织形式来干预国家权力的运行。私下的政治网络开始潜滋暗长。私人武装组织和游说组织纷纷涌现。传统政党和议会无法有效组织、表达各个统治阶级的诉求，变得越发形同虚设。

这便为法西斯政党的崛起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当法西斯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颇有声势的群众运动之后，垄断资产阶级迅速察觉到，由于法西斯政党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底色，可以将它作为有力的政治工具，达到击溃其他统治阶级、建立自身政治主导权的目的。垄断资产阶级开始或明或暗地支持法西斯政党，帮助其一步步走上政治舞台。原本代表其他统治阶级利益的传统政党，在失去了原来的阶级基础之后，根本不堪一击，最终被法西斯政党击溃。

换句话说，崛起中的法西斯政党，为垄断资产阶级充当了政治打手，帮助垄断资产阶级实现了他们的政治诉求——一方面取代地主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独享政治领导权；另一方面大大强化了对工人阶级的镇压和剥削。

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国家形态彻底转变为「积极干预式国家」，从根本上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整体利益。然而，法西斯政权为了巩固自身，同样需要安抚其他阶级，因此在具体的议题上，完全可能违背垄断资产阶级的意愿，向其他阶级做出妥协。



然而，还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们：为什么法西斯主义一开始能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发展成蔚为壮观的群众运动呢？为什么工人阶级没能有效地反抗法西斯主义呢？普兰查斯进一步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扮演的历史角色。

### 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在分析小资产阶级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关系之前，普兰查斯先对「小资产阶级究竟是什么人」这一问题进行了说明。

在普兰查斯看来，抛开农村不谈的话，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是由在经济生产关系中占据完全不同位置的两群人组成的：一是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小规模手工业生产者和商业个体户，二是不进行体力生产劳动、从事文职工作、拿固定薪水的雇员。

这两类人虽然在经济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共性，但他们在生产关系中占据的不同位置却给了他们相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他们一方面对资产阶级**羡慕嫉妒恨**，一方面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夺走他们掌握的那一点点经济特权。因此，他们希望在资本主义的现有框架下进行改良，希望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达到他们眼中的「公正」、而不是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希望增加社会流动性使自己有成为资产阶级的机会、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国家权力应该是客观中立地、高高在上地调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以达到社会和谐，并认为自己是这种中立的国家立场的代言人。

普兰查斯顺便指出，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充分说明了非经济因素在阶级分析中的重要角色。**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统一、而不是经济状况的统一，才是小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的存在基础。**

在法西斯政党出现之前，德国和意大利的小资产阶级还不具备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的能力，只能寄希望于代表各个统治阶级的传统政党能「顺便」代表一部分自己

的利益。然而，随着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各个统治阶级开始抛弃他们原先的政党，这大大摧毁了传统政党的动员能力和影响力，使得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沦为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

与此同时，在垄断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损害，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被逼到了无产化的边缘。

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层面的双重困境，为法西斯主义动员小资产阶级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正如之前提到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主义，源自于随着垄断资产阶级兴起而出现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但它在传播过程中，又结合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元素：本土排外主义、国家权力崇拜、对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的不满、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意识形态动员的成功，使得法西斯主义受到小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换句话说，在最初诞生之时，法西斯主义的面目是一场植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借由法西斯政党，小资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而法西斯政党，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短期经济利益。

然而，在垄断资产阶级将法西斯政党成功收编，把法西斯政党变成打击其他统治阶级、夺取政治领导权的工具之后，法西斯政党就彻底抛弃了对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代表。尤其是在法西斯政权确立之后，国家从根本上服务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受损最大的就是小资产阶级。

但小资产阶级对法西斯政党和法西斯政权的支持却从始至终热情不减。这充分说明，**经济利益不仅不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对小资产阶级的强大吸引力，以及法西斯政党在组织结构中对小资产阶级成员的吸纳，使得小资产阶级坚信法西斯政党代表自身的利益。

## 工人阶级与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前的德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遭受了一系列惨痛的失败。

1918–1919 德国革命期间，希望建立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的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的前身）发动一波起义浪潮，最终被社会民主党政府血腥镇压。1920 年，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目标的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同样遭到镇压，彻底失败。

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尝试组织了一系列罢工和暴力抗争，但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工人阶级的动员基础随之迅速恶化：工会成员规模急剧下降、共产党的影响力不断式微、工人运动的抗争诉求从政治场域（夺取政权）转向经济场域（追求经济与劳动权益）。

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被一种强大的政治无力感笼罩。不过，工人阶级在之前一波波斗争中赢得的政治经济权益依然得以保全，掌握国家权力的中等资产阶级也愿意通过妥协路线来联合工人阶级、共同对抗垄断资产阶级。

但是，垄断资产阶级借助法西斯政党的力量，对工人阶级发起了最后的猛攻，以彻底夺走工人阶级手中硕果仅存的政治经济权益。法西斯政党一方面武力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手段瓦解工人阶级的抵抗意识。

面对法西斯政党的进攻，工人阶级为何没能发起有效的抵抗？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工人阶级政治运动遭遇一系列惨痛失败之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号召力大大下降。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梦想破灭后，各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其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反资产阶级元素而受到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欢迎。而法西斯主义在动员过程中，充分嫁接上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元素，取得了一部分工人阶级支持。另一方面，随着夺取政权的尝试失败，许多工

人阶级开始认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希望在民主和法治框架内，以阶级协商的方式争取利益，因此转而支持社会民主党。

奉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社会党）虽然坐拥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支持，但根本无法阻挡法西斯政党的攻势。他们信奉阶级合作和妥协，支持渐进改良，希冀通过已有的议会制度和法律框架调和政治冲突。面对法西斯政党的兴起，他们希望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与其进行磋商，丝毫没想过通过制度外的手段对法西斯政党进行反击。这一路线的结果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政党的崛起而什么都没有做，直到被夺取政权的法西斯政党以一纸禁令解散。

而另一边，遭受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失败之后的德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组织动员能力被严重破坏，工人阶级支持者也不断流失。而更糟糕的是，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以一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心态看待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他们将社会民主党人视作历史发展的主要障碍，乐于见到社会民主党被法西斯政党消灭；而他们又天真地相信，法西斯政党一定不会长久，只需要等到法西斯政党不可避免地崩溃，无产阶级就可以顺势夺取政权。这样的判断，使得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最初几年里采取了一种近似于绥靖主义的态度。

当共产党人意识到政治形势的真正走向时，他们终于扛起了反法西斯主义的大旗，开展了一系列反法西斯主义武力抗争，但为时已经太晚。不过，无论怎样，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是唯一进行过坚定反击的政治力量。他们不屈不挠的抵抗行动以及最终的惨烈失败，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

普兰查斯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大背景下，德国和意大利的各个阶级之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不平衡状

态，从而决定了一条灾难性的阶级斗争轨迹。它并非某一个阶级独自导致的结果，而是各阶级在互动过程中不知不觉养育的怪胎。

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最先陷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困境，作为群众运动的法西斯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对自身困境的反应。而这股力量在初具规模之后，被垄断资产阶级发现、支持、利用，成为垄断资产阶级争夺政治经济领导权的武器。小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潜在的利益冲突和张力，贯穿法西斯主义崛起和巩固的全过程，成为法西斯政权中主要的不稳定因素。

而在法西斯主义崛起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一直被一系列重大政治失败的创伤所笼罩，力量严重弱化，士气极其低落。动员能力的剧烈衰退和对于形势的判断失误，使得工人阶级无法有力地发起反抗。

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阶级斗争的路线和结果并不是被生产力发展水平所直接决定的，而是有着独立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两个因素——政党和意识形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代表各个统治阶级的传统政党的崩溃、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妥协、共产党的动员能力下降和错误的策略，为法西斯政党铺平了走向政治舞台、夺取国家权力的道路。而统治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对小资产阶级的高度吸引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的号召力消退，深刻地影响了各阶级在政治危机面前的选择。

虽然普兰查斯没有对农民各阶级在法西斯主义崛起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系统、充分地考察，虽然他的某些具体论断被后来的法西斯主义研究者证实是与史实不符，但他所建立的整个理论框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脉络上一种极为重要的探索：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坚守其基本分析原则的同时，又能在不断解释经验现实的过程中焕发新的活力？

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罗莎 – 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到葛兰西，在试图解决他们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政治问题时，都表现出这样一种分析倾向：拒斥生产力决定论，关注具体的阶级斗争状况，强调政党和意识形态的作用 —— 简而言之，将「政治」带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当中。

而这，也是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今天的政治现实时，必须继续完成的使命。

### 参考文献

- Poulantzas, Nicos. *Fascism and Dictatorship: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nd the problem of Fascism*. New Left Books, 1974.

（原载《政见 CNPolitics》，2017年3月3日）

法西斯又来了？——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

（原标题：《纳粹德国都那么怂，你怕个什么法西斯》）

“装甲巡洋舰曙光号”

狼烟再起？



最近的世界颇不太平，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梅，两个右翼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当朝执政，日本的安倍晋三也不守规矩，各路保守派头头们也蠢蠢欲动，法国，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极右势力也有当权的可能。有些人看到这副光景就被吓怕了，仿佛希魔（希特勒）转世，昭和（二战时期日本天皇）再临，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头目）的棺材板儿也按不住了，世界将重新落入法西斯势力之手，只差一个“国会纵火案”，这帮宵小之辈就能修宪自立一样。人民将陷入无限的苦难，强大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将把每个人牢牢锁住，历史将进入又一个黑暗时期，进步势力只能望而却步，任人宰割。

**坦率地说，这纯属《1984》综合征。**没有经历过法西斯政权的人们，总是倾向于把法西斯国家机器想象成为：（1）胆大妄为；（2）无所不能；（3）内部团结一致的钢铁政权。仿佛平日里经常打交道的占个茅坑不拉屎的底层官僚一下子就会变成铁面无私的忠诚爪牙一样。这些被吓坏的人们把平时所学的公共选择理论（国家公务员为自己而不是国家

服务，国家机器相当低效），阶级分析，乃至初中历史都忘到了九霄云外，对他们来讲，法西斯俨然成为了一个不可以被分析的神迹。

一句话，他们怂了。**其实法西斯根本就不可怕**，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最法西斯的国家纳粹德国在其最嚣张的战争时期（1939-1945年）都出了什么荒唐事吧。

为啥不早点动员？



战争总动员是一个国家权力全力战争、决不妥协的最终形态，其目的是动员一切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因素为打赢战争服务。当出现世界大战你死我活的局面时，越早展开战争



动员，就越能在物质上压倒对手。二战期间，英国于 1939 年，美苏于 1941 年各自参战时就开始了全面动员。但是战争动员意味着民用经济的萎缩，对普通群众讲，意味着每年只能添一两件衣服（质量也会下降），只能吃很难吃且没多少营养的食品（黑面包取代蛋糕，咸土豆取代香肠），取消大部分的娱乐（歌剧电影黑啤酒限量供应），停止供应民用汽油等一系列闹心的事情。一句话，生活水平会受到严重影响，严重的话会引起对本国政府的不满，导致士气下降乃至兵变等。对于参战国来讲，始终存在一个打败敌国和不被民众推翻之间的抉择。

纳粹德国对于这个问题有着惨烈的教训和清醒的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由于过度的战争动员加上协约国的经济封锁，德国国内民众生活状况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而德国贵族军阀们仍然坚持压榨民众，试图攫取最后一点战争资源，导致国内后方不稳，前线士气崩溃。当德军统帅部命令帝国海军做自杀性攻击时，基尔海军基地的水兵们揭竿而起，反抗暴政，最终于 1918 年推翻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尽管后来的纳粹党把责任都推到了犹太人和德国共产党身上，说他们破坏战争导致失败。但是纳粹党十分清楚，德国民众的不满才是帝国被推翻的根本原因。因此，这个利用 1929 年经济危机上台的法西斯党一直把实现全面就业，维持民众生活水平当做维持自己执政地位的重要条件之一。所以，纳粹党才会实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重化军工投资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劳资妥协政策。纳粹党的阶级基础是大容克资产阶级，而构成其群众基础的，正是在其经济政策中获得稳定就业和以及生活改善的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一旦失去群众基础的支持，纳粹党被德国民众推翻只是个时间问题。

因为害怕民众的反抗，纳粹党不得不一再推迟战争动员。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是 1939 年 9 月 1 日打响的，可是迟至 1943 年初，纳粹党都没敢实行战争动员，直到斯大林格勒打了场大败仗才开始动员。这反映了法西斯国家机器对民众诉求的妥协。可就是这样，德国民众也不满意。在还没开始动员的 1939 年，德国未来的将星曼施泰因元帅

就以一种“这届人民不行”的态度抱怨民众参战热情冷淡，步兵攻击精神太差，以至于有些部队居然还能被波兰骑兵吓个半死。

推迟战争动员的后果是严重的，纳粹德国在开战的前三年基本保证了民众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且新占领地区提供的农产品（乌克兰的小麦，法国的牛奶，荷兰丹麦的鸡蛋，巴尔干的水果等）纷纷涌上了德国民众的餐桌，掳掠来的占领区人民也有一部分成为了德国人的家庭仆役。但是由于没有开展动员导致的人力和物质不足，德军在前线的损失一直没能得到有效补充。导致 1942 年夏季攻势（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高加索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兵力兵器疲竭，最终在斯大林格勒一败涂地。

由此可见，即使是法西斯政权，它在做出决策的时候，也不得不对民众的需求有所忌惮。它作为资产阶级政权，势必面临者镇压民众与讨好民众的选择。所以我们得出了第一个结论：**法西斯政权绝非能够为所欲为，它也有不敢做的事情。**

### 养那么多后备军干什么？

第二个典型事实是德国后备军的数量。从“德国国防军报告”网站中，我们可以找到各个时期德军人力分布的变化如下表：

年代	野战部队	后备军	空军	海军	党卫军	外国辅助人	非战斗人员	纳粹党官员	军工人员
1939	2,740	965	400	50	35	—	500	501	38,725
1940	3,650	900	1,200	250	50	—	550	362	35,014
1941	3,800	1,200	1,680	404	150	20	900	344	35,100
1942	4,000	1,800	1,700	580	230	70	1,200	348	34,528
1943	4,250	2,300	1,700	780	450	100	1,700	361	35,235
1944	4,000	2,510	1,500	810	600	350	2,300	343	34,815
1945	3,800	1,500	1,000	700	830	71	1,800	298	34,619

（人数皆为千人）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从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到 1944 年德国大势已去，德军野战部队数量一直在 380 万到 400 万之间徘徊，但是其后备军人数却从 120 万上升到了

251 万，而非战斗人员数量则从 90 万上升到了 230 万。两者相加，从 1941 年到 1944 年间，在野战部队数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德军往后备军训练营和后方机关竟塞了整整 270 万人！在 1941 年，一个后方人员（后备军+非战斗人员）可以服务两个野战人员，到了 1944 年，则需要 1.2 个后方人员服务 1 个野战人员。如果说德军顺风顺水的 1942 年前出现这种现象无可厚非，但是即使在决定命运的 1943 年到 1944 年之间，德军在各条战线上兵力捉襟见肘，总野战兵力缩水了 25 万，但是后备军却奇迹般地增加了 21 万！这是一幅何等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模样。这些脱产的后方人员占用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却对前线日益紧迫的战况毫无助益。一些人总把纳粹德国的官僚体系当做法西斯政权极高效率的典范，但是看着这数以百万计的闲杂人等（约占战前总人口的 5%），是不是也该清醒一下？

据统计，二战期间参与德国战争行为（军事，经济等一切相关行为）的总人数一直在 4400 万之间，排除俘虏和奴隶劳工，其人数也应占到战前德国总人口的 45% 以上。动员这么庞大的人力开动战争机器势必会面临着官僚主义，裙带关系，消极怠工等一系列的问题。谁都知道上前线的伤亡率极高，所以谁都想留在后方，当国家机器的执行人员自己及家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时，各种通过走后门拉关系的方式留在后方的情况也会激增。这一方面说明法西斯官僚体系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也是德国人民消极反战，拒绝为法西斯卖命的一种斗争方式。

由此，我们的得出了第二个结论：法西斯政权的政令实行绝非如臂使指，它也有想做而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没跳过伞的伞兵与“空军装甲师”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德国空军的。我们可以看到，德国空军在鼎盛时期有 170 万人。而一个人所服务的飞机的数量却明显低于美苏等国，考虑到德国没有战略轰炸机这种需要好多人伺候的大家伙，其空军人员的服务效率要远低于美国。

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空军有着非同一般的任务：地面作战。自 1941 年克里特空降战役德军伞兵精锐尽丧之后，伞兵就基本被当成步兵用了。然而，空军作为纳粹党的亲兵，与党卫军一样有着监视和制衡国防军（德国军官团掌控国防军，与纳粹党有一定距离，但他们也执行镇压民众和侵略扩张政策）的作用，于是一大批“空军野战师”被建立起来。这些空军野战师用的是最好的装备，享受的是空军的待遇，但为了抵制国防军的影响，他们的训练是空军自己完成的。这帮没有经过陆军专业训练也没有陆军老兵士官指导的新兵蛋子一上战场就被打蒙了，在斯大林格勒，四五个空军野战师被苏军打得七零八落。于是以后只能在北线的列宁格勒去打打那些饿的面黄肌瘦的苏军（如上图中在北线诺夫哥罗德附近作战的第一空军野战师）。曼施泰因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空军野战师的差评，他认为与其把这些精良的人员和装备组成一个个没用的空军野战师，不如把他们补充进陆军，空军野战师纯属是一种浪费。

但希特勒和戈林（纳粹党二号人物，纳粹空军头目）不这么想。他们需要手中掌握一只独立于国防军的武装，来平衡国防军军官团的势力，在未来国防军可能叛变时镇压他们。所以，空军不仅拥有了一般的步兵部队，还组建了直属空军的“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作为一只给空军撑门面的部队，它最早装备了“虎”式坦克。然后，为了纳粹党的面子和空军的荣耀，这支隶属于伞兵、但却从未跳过伞，只能开坦克的部队被投入到已经必输无疑的北非战场（1943年初，突尼斯），并在那里被盟军吊打围歼。

由于大量的兵员和装备被纳粹党优先装备给自己的嫡系部队（党卫军，空军），导致作为战争主力的一百多个国防军步兵师一直处在兵源不足的状态。一个步兵师在 1939 年编有 9 个徒步步兵营（一个营 1000 人左右），一个摩托化侦察营，一个炮兵团以及各类师直属单位，满员状态约有 17000 人，实力充沛，可以进行各种任务。其中，师属侦察营是步兵师唯一的摩托化战斗单位（比只能靠脚板走路的步兵营快很多），装备有摩托车和装甲车等。在进攻作战时是主要的突击力量，在防御作战时是重要的机动预备队，同时也是全师的“眼睛”。1942 年后，因为工业动员步骤缓慢，装备优先给了嫡系部队，侦察营被取消。同时，由于大量人力没能补充到一线作战部队，以及嫡系部队争抢兵源，每个步兵师被迫在 1944 年裁掉三个步兵营，并且把原有的摩托化侦察营换成了一个普通的步兵营。这样，全师只有七个徒步步兵营，总共 12000 人，由于裁掉的都是战斗兵员，导致步兵师持续战斗能力极差，往往只能执行静态防御任务。这样的步兵师，没有侦察营作为前导，进攻乏力，没有机动预备队，防守困难，没有专业侦察部队，成了聋子瞎子。曾经是德军骄傲的步兵，到了战争后期成了打也不能打，跑也跑不掉的累赘。

其实，纳粹党，或者说法西斯政权才是军队战斗力真正的累赘。由于歧视性的物资分配，导致国防军一般步兵部队战力贫弱，士气低落，无法与党卫军和装甲部队有效协同，致使许多战役功亏一篑。由于需要大量党卫军监视国防军，导致后期党卫军数量病态膨胀，许多没有经过训练的外国伪军和集中营官僚纷纷加入，但是国防军久经战阵的部队却得不到

**武器。**自 720 事件（由国防军军官组织的刺杀希特勒事件）发生后，纳粹党愈发不信任国防军，在国防军内安插眼线，干预指挥。为了进一步孤立国防军，纳粹党宣传部门居然也组织了自己的武装（人民冲锋队），进一步挤压了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人力资源。

所以，我们得出了第三个结论：**法西斯国家机器绝非铁板一块，任何资产阶级政权可能会出现内部派系纷争都会出现在法西斯政权中，有时还会更激烈。这进一步限制了法西斯政权的国家能力。**

### 法西斯国家逃不过阶级分析



从上面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法西斯国家机器：1、有很多不敢做的事；2、敢做的事也不一定能做成；3、派系内耗严重。这一切都颠覆了許多人眼中法西斯国家无所不能的形象，而且，就算是法西斯国家的祖师爷级的代表纳粹德国也无法逃脱这些限制。那么为什么会出現这样的情况呢？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维持阶级统治的工具，法西斯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都会存在于法西斯政权下。资本主义面对的资本积累危机（如何为资本家维持利润率），阶级冲突（如何为工人群众提供一定的生活条件且不过分伤害利润率），以及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和世界体系危机等如果不能在法西斯政权的框架内解决，那么要么法西斯政权会被抛弃，要么资本主义本身会被抛弃。

法西斯政权确实可以通过镇压的手段来压制人民的反抗，但是镇压本身是有限度的。当法西斯政权对人民的压榨（如战争动员，私有化，去管制和打击工会等）越强时，它就把自己摆到了占人口比例越大的民众的对立面。为了镇压这些民众的反抗，它势必会组织越来越多的军警力量，建立越来越庞大的行政机关来履行越来越复杂艰巨的镇压任务。但是，他所能动员的人数受到其群众基础的限制，当他不得不在利益受损的普通群众中大量征召基层军警时，国家机器本身的效率和忠诚度就会打折扣。所以，《1984》里出现的动员整个专政机关去镇压一个心不在焉的公务员的情况，在现实的法西斯国家中，是既不划算，也不现实的。而纳粹德国把大量的人员塞进后备军这种典型的总政才是常态。从表一反映的状况看，纳粹党唯一的死心塌地的支持者就是自己的官僚人员，他们在战争中被大量补充进党卫军。而纳粹党官僚加上党卫军（算上外籍志愿者）最多不过战前总人口的 1.3%-1.5%。而在春醒行动中（1945 年春）临时征召的党卫军也出现了严重的厌战情绪，出现了大量的抗命不尊的情况，以至于希特勒在盛怒之下剥夺了“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荣誉臂章。

另一方面，给劳动人民发枪发警棍让他们镇压自己，对法西斯统治者也是十分危险的。随着大量的工人群众接受军事训练，且拥有武器时，统治阶级的地位也会受到威胁。对于坐着称霸欧洲大梦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来说，昨天还温顺恭敬的“灰色牲口”（资产阶级对沙俄士兵的蔑称，因其制服颜色为灰色而得名），今天就成立了“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1917年春），明天就发动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后天就把沙皇枪毙了。从社会分工和阶级形成的角度来讲，法西斯政权为了镇压人民和对外扩张而设立的大规模常备军简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学校。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红军中的许多将领都曾经在旧军队中就职，在旧军队和旧政权中掌握的夺取国家和管理国家的经验本领，成为了他们在革命生涯中不可多得的财富。因此，法西斯政权越猖狂，越是獠牙毕现地镇压民众，它就越依赖民众，越需要民众喂养它庞大的躯体，因而也就越虚弱，越不堪一击。

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





从全局看，法西斯国家政权在打击某个个人时是强大的，但是在面对人民时，它又是弱小的。从局部看，法西斯政权少数最有效率的专政机关在针对弱小的个别反抗时当然很强大，但是占绝大多数的消极怠政的基层政权也绝不是有组织的民众的对手，甚至在特定情况下会倒向民众。

任何一个暂时成功（不会永远成功）的法西斯政权，都是建立在解决当时资本主义部分矛盾的基础上。今日上台的右派政府，既对恢复利润率无计可施（压低工资基本不可能，贸易谈判基本失败），又不能哪怕是暂时提高一下民众的生活水平（私有化和去管制势必伤害劳动人民），而且都没有取得本国资本家集团多数以及军方的明确支持，官僚机构本身也对其爱搭不理，在自己党团之内的名声与威望都很堪忧。就这样一个半吊子的政权，是否出现“政令不出白宫/唐宁街”的结果还未可知，让他们去当法西斯真是高看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处在外围和半外围的国家（如印度，巴西，越南），由于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会有相当一部分以不平等交换的形式“进贡”给发达国家，所以能维持的统治阶级人口比例更小，能够有效收买的官僚队伍更小，社会矛盾会更尖锐，镇压任务会更繁巨，因此如果出现法西斯政权，其国家能力也会相当贫弱，也更容易被社会革命所粉碎。

法西斯可怕吗？不仅不可怕，相反，法西斯分子他们自己还害怕得很，法西斯害怕的是联合起来的人民群众。随着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乃至白领小资都能逐渐认清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并开始主动为无产阶级和人类未来而奋斗。同时，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进步民众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会筑起反抗法西斯的高墙，也会举起斩断资本主义的钢刀。

#### 参考文献：

1.德国国防军报告网站：<http://wehrmachtbericht.com/page14.php>

2.恩格斯：《反杜林论》

《闪电战》杂志第五十期：“戈林元帅的掷弹兵——二战德国空军野战师简史”

<http://www.resilience.org/stories/2017-02-16/awaiting-our-own-reichstag-fire/>

3.Wallerstein I.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capitalist system: concepts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J]. Comparative studies insociety and history, 1974, 16(04): 387-415.

（原载《红旗太平洋》2017年3月4日）

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

### “装甲巡洋舰曙光号”

3月3日，张跃然先生在“政见”公众号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文。该文随即被“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转载。

在这篇文章中，张跃然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观点：意识形态是促成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决定因素，经济利益“不仅不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

这种观点认为，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转变“国家形态”，把“自由放任式”国家扭转为“积极干预式”国家；小资产阶级则出于对垄断资本的“羡慕嫉妒恨”和对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及坚持社会“公正”的理念自觉充当自带狗粮的帮凶；无产阶级则是由于“梦想破灭”之后的“感伤主义”，和期望大小资产阶级内斗的看戏心态而放弃了抵抗，任人宰割。其中，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本土排外主义，国家权力崇拜，对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的不满和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恰好符合了小资产阶级的“公正”观，而且填补了深陷“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泥潭的无产阶级的空虚心灵，于是在大资产阶级的操控下翻身上马，一统江山，造就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就张跃然先生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 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决定论”

张跃然先生既然自称想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那么势必会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讲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

定化。”那阶级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恩格斯这样说道：“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而张跃然先生自称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从下述原理出发”的：“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如果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关于阶级和国家问题就只能有一条逻辑线：物质生产和分工造就了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为维护其攫取剩余产品的能力而建立了用于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国家机构。因此，包括法西斯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器（包括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当然，当阶级力量势均力敌时（而不是由于某些奇妙的意识形态在某些个人脑中炸裂），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当然，这种独立性是现实斗争的产物，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虚构。

具体地，对于法西斯统治所依赖的资产阶级而言，其“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共产党宣言》）”。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任何可能威胁到 1、私有制；2、资本积累的行为都会遭到资本家的抵抗。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阶级本身的产生，阶级斗争的成因和结果，都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式决定的。这些一再被历史证明的东西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如果这些都能被张跃然先生称为“经济决定论”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都应该骄傲的宣称自己是“经济决定论”者。

张跃然先生自己也承认，在“普兰查斯看来，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了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各个阶级”。按照张跃然先生的看法，那种应当受到批判的“经济决定论”的本质，是“将政治现象简单归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粗体是笔者加的）的解释框架。”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种“经济决定论”将所有的政治经济现象不加区别，不顾抽象程度地挂靠在某些具体指标上，仿佛只要达到了某个指标，各个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变革就会自然来到，共产主义的天国就会自然到来。这种观点当然是庸俗的，它有一个专门名称叫“线性历史观下的唯 GDP 主义”，它是二十世纪末某些“转型经济体”（资产阶级经济学名词：指那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等国的腐化变质的统治阶级建立自身合法性的借口。张跃然先生批判这种庸俗的“唯 GDP 主义”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张跃然先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摒弃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试图绕开现实物质利益，而用意识形态解释阶级斗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这就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 意识形态的大饼能喂饱民众吗？

在讲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时，张跃然先生的观点立足于他们在作出历史抉择的时候，出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统一，而不是经济状况的统一”。 简单地说，是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心理疾病，无产阶级由于前一段时间受到的失败以及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受到了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诱骗，做出了明显有违自身利益的选择**。其中，小资产阶级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继续挤压，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也“大大强化”。照此说法，法西斯统治下的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事实如此吗？

张跃然先生指出了两种“小资产阶级”的来源。一种是掌握部分生产资料，但是不能支配别人劳动的小业主，另一来源是不掌握生产资料，但是可以掌控一部分别人劳动的官僚、职员。但是在文章中张跃然先生并没有仔细分析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事实上，在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候，小业主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已经不是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阶级。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以官僚、职员为代表的现代小资产阶级，而他们在纳粹党上台时是得到明显的好处的。

首先，作为给大资本和国家机器打工的官僚和职员，德国经济形势，尤其是经济增长状况对于他们的饭碗和工资都是极其重要的。据历史统计，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值，单位为 1990 年国际元），从 1932 年的 3362 国际元上升到 1939 年的 5406 国际元（数据来自麦迪逊世界历史统计资料）。其中，德国的人均 GDP 自 1935 年起就超过了经济危机前的最高水平，而法国直到 1939 年，美国直到 1940 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最高水平。迅速发展的国内生产和扩军备战的需要吸纳了被经济危机和凡尔赛条约排挤出去的小资产阶级。以德国国防军规模为例，1933 年，国防军只有凡尔赛条约规定下的 10 万人，到 1936 年，德军就组建了包括三个装甲师在内的超过 50 万军队，而到了开战前的 1939 年，德国武装力量总数已经超过了 450 万（德国国防军报告网）。过去被迫在外当打手、当保安的职业军官团和以各种名义存在的法西斯民兵组织被大量吸纳进国防军，成为了吃皇粮的正式雇员。像莫德尔、古德里安、隆美尔等在校官乃至尉官位置上窝了十几年的老油条，在三、四年之内以火箭般的速度被提拔成了将军。为了搞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军工投资而扩编的官僚和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满足了小资产阶级对于就业稳定性的要求。所以，小资产阶级事实上是从法西斯政权中获利的一部分。

无产阶级的情况呢？宏观上讲，纳粹政权相当清楚魏玛政权的倒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无法解决就业问题。所以，在其上台之初，就一方面缩减工作日，另一方面实行经济扩张政策。根据《纳粹德国劳动者保护政策研究》，德国工人的工资总额从 1933 年的 113.2 亿马克上升到了 188.37 亿马克，同时失业率从 1932 年的 30.1% 下降到 1938 年的 2.1%

（《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到 1939 年，德国甚至发生了劳工短缺，以致不得不从工厂里直接征兵。同时德国工业产量指数在 1932 年到 1936 年之间翻了一倍。1932 年到 1938 年，德国工业工人名义工资上涨了约 27%，同期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约 13%，两相加减其实际工资大约上涨了 12%。所以，在法西斯上台后，德国在消灭失业的基础上还为工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水准。

微观上讲，从 1932 年到 1938 年，德国的一岁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七十九下降到千分之六十。纳粹政权尽管号称自己“要大炮不要黄油”，但是黄油产量却从 1932 年的 42 万吨上升到了 1940 年的 62 万 7 千吨。肉类产量也从 1932 年的 310 万吨上升到 1938 年的接近 370 万吨，这个增长甚至还快于后来联邦德国同等产量时的增长。啤酒产量从 1932 年的 33.5 亿升提升到了 1939 年的 51.3 亿升。由于黄油，肉，啤酒基本不能用做再投资，它们都是直接的消费品，而德国资产阶级的肚皮就那么大，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平均而言，德国无产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争爆发前确实是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

梳理德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状况，我们并没有发现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的乖离，反而是法西斯为了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不得不对工人做出妥协，而正是因为这种妥协有效地（当然只是暂时的）收买了德国小资产阶级和至少是部分的工人，德国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民众不满。所以，德国工人阶级并不傻：意识形态的说教，SM（萨德马索克主义）的迷狂，国家至上的宣传和雅利安民族的神圣都不能喂饱德国工人阶级，要想暂时收买德国工人，暂时麻痹其斗志，要真金白银，啤酒腊肠才行。

### 抛开意识形态的迷雾，唯物地看待法西斯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有什么特殊的魅力。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资本积累危机。从资本主义历史整体出发，我们可以看到，1929 年到 1933 年的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标志性时期。随着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度的崩溃，以往自发调节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国际机制不复存在，各国都开始向

后来的“大政府资本主义”转变。这并不是因为什么大资本要击垮小资本，而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排除金融投机的表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基本上都表现为利润率和投资恶性循环式的交替下降。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越广，程度越深，世界市场联系愈发紧密时，这种恶性循环就越有势如山崩的效果。生产萎缩，投资崩溃，民众失业吃不上饭开始上街闹事，或者争着向当时的苏联移民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也就陷入危机。为了挽救整个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国家，就出面试图打断这个恶性循环。要么给资产价格兜底，要么扩大投资，要么干预货币，只要能够走出这个循环，救资本主义于水火，什么偏方都会被病急乱投医的资产阶级使用。法西斯主义的扩大重化军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定程度的劳资妥协和收买小资的阶级政策，以及拒缴战争赔款的政策恰好能够缓解德国资本主义当时最紧迫的危机（利润率、阶级冲突）。

所以，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不是因为它能忽悠，而是因为它至少部分地，暂时地解决了资本主义危机。当危机没有那么严重时，资产阶级对纳粹党基本上是一副弃之如敝履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 1924-1927 年德国经济状况暂时好转，纳粹党的支持率就开始下降，甚至发生斯特拉塞（北方纳粹党领袖，一度与希特勒分庭抗礼）、鲁登道夫（德国一战将领，纳粹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等人领导的分裂运动的原因。而如果有危机却不能解决，不能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框架下暂时满足各阶级最紧迫的利益，别说工人阶级，就是经常拿着自己打仗的本事待价而沽的军官团都不会搭理纳粹党。这也是 1944 年 7 月国防军军官团在三名元帅的组织（维茨莱本、克鲁格）和默许（隆美尔）下，利用国防军反政变演习（女武神计划），试图刺杀希特勒的原因。

法西斯不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它是由特定时代、特定国家、特定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然法西斯政权不是什么“天上神物”，那它就和其他一切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样，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也要处理利润率，处理阶级关系，养活占人口



比例越来越大的官僚机构（参见“红旗太平洋”上一篇文章：《纳粹德国都那么怂，你怕个什么法西斯》），也可以被打倒和消灭。战胜法西斯的第一步，就是停止自我恐吓，从思想上对其“祛魅”。惟其如此，法西斯才能成为可以被分析的事物。

### 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在转载张跃然的文章时，对“红旗太平洋”上一篇文章关于法西斯的文章做了个简短的评论。他们认为，我们上一篇文章表达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当“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会比法西斯上台前更难，而不是更容易。”

坦率的说，“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并不是特殊地害怕法西斯，而是一般地害怕一切有可能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事物。说白了，就是害怕在阶级斗争中受到损失。我们非常能够理解这些同志爱惜其他同志们生命的想法。但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会因为工人挂上“免战牌”而停止。资产阶级，如往常一样，会主动在工人阶级脆弱的时候发起进攻，这是工人如何害怕都不会避免的。对于工人来讲，抛弃幻想，准备斗争，是必须要有的姿态。

那么问题来了，工人阶级为何而战？为了牺牲？为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个人英雄主义？为了视死如归，冲向黑暗的蛮勇无畏？都不是，工人阶级是为胜利而战。既然是为了胜利，而不是牺牲，那么明确分析敌人的弱点，寻找可能的突破口，积极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才是战胜法西斯应有的态度。否则就难以避免在对抗法西斯问题上陷入“速胜论——亡国论”之间无头苍蝇式的摇摆。

历史上，在 1927 年国民大革命失败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只要反动派解决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无论他蒋介石再怎么模仿法西斯，都会有

千千万万人站出来继续革命事业。我们相信，当年的中国革命者“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勇气与乐观，绝不会在今天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泯灭。

**参考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列宁：《国家与革命》

《纳粹德国劳动者保护政策研究》

《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

《第三帝国的兴亡》

《逃避自由》

麦迪逊世界历史统计资料：<http://www.ggd.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德国国防军报告网站：<http://wehrmachtbericht.com/page14.php>

（原载《红旗太平洋》2017年3月6日）

##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不乐观，却很盲目

### “猎潜艇 271 号”

《红旗太平洋》撰稿人“装甲巡洋舰曙光号”与《政见》评论家张跃然之间关于法西斯主义的论战，渐入佳境。讨论的是法西斯主义问题，实际上辩论的是现实斗争。张跃然先生拾普兰查斯之牙慧批什么“经济决定论”，实际上就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证明，这样的历史唯心主义，自从在西方学术左派中泛滥以后（自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开始），既没有挡住法西斯主义，也没有挡住新自由主义，现在面对资产阶级极右势力的猖獗，眼看又要败下阵来。如此百年一贯的失败记录，不好好总结自身教训，还要“批判”世界其他地方的进步和革命斗争，只能说是缺少了一点自知之明。

不过，张跃然先生毕竟是写了文章的，没有功劳，亦有苦劳，确实凝结了一定的社会（或非必要）劳动时间。倒是《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政资研编辑部，更加懂得投入产出法，转载之余，三言两语，便将“装甲巡洋舰曙光号”推下擂台。“装甲巡洋舰曙光号”认为：“纳粹德国都怂了，你怕个什么法西斯？”；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却坚定地认为：法西斯可怕！可怕！实在是可怕！

*不久前，“红旗太平洋”的同志发文称：法西斯没什么可怕的，其统治难以持续。这又是另一种盲目的乐观——即便法西斯无法持续又如何？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会比法西斯上台前更难，而不是更容易。*

你看，法西斯一上台，即使“无法持续”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毁灭、打击、破坏，这还不可怕吗？这还有救吗？谁不承认法西斯可怕，谁就是“盲目乐观”，这个帽子扣定了，必须戴，不戴也要戴。

笔者认真阅读了“装甲巡洋舰曙光号”的文章，发现那是一篇历史论文。既然是历史论文，那就是关于在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的事情，不是想象的事情，因而不可能是盲目的。“装甲巡洋舰曙光号”论证，即使是号称强大、高效、“祖师爷级”的纳粹德国，也是内部矛盾重重，为各种利益集团所牵制，乃至不得不对工人阶级做有限的让步，有数据、有史实、有分析，何来“盲目”？

倒是《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一句“盲目乐观”完全属于无的放矢。无的放矢者，就是看不见目标便乱射箭、乱攻击；看不见者盲目也。《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自己不“乐观”，还要反对别人“乐观”，实在是源于自己的“盲目”。

如果说，法西斯主义即使“无法持续”，工人阶级也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那么，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还能有超过纳粹德国的吗？纳粹德国被苏联红军消灭以后，德国工人阶级垮了吗？在东部，在苏联的支持下，德国工人阶级一度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即使在西部，也建立起了巩固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一度出现了社会改良主义的黄金时代，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经济权利都有了很大的增长。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退步呢？是德国工人阶级垮掉了，还是德国工人阶级力量上升并迫使资产阶级让步呢？至于世界范围，更是一度出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大好局面。这不都是在法西斯主义“无法持续”以后发生的吗？世界历史的经验证明，经过了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磨炼，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被削弱了、被毁灭了，而是更加坚强、更加壮大了，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世界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做出很大的让步。

至于说，法西斯一旦上了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只会比法西斯上台前更难，而不是更容易”；不知道这是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经过慎重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如果是，那么该公众号的研究水平着实堪忧。我们知道，所谓“法西斯”源于古罗马的一种“权杖”，而“法西斯主义”除了特指在意大利、德国等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资产阶级独裁政体以

外，有时也泛指一般的军事独裁政权。比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曾经在中国实行过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

那么好了，中国革命是怎样胜利的呢，是不是打败了蒋介石独裁政权以后胜利的呢？俄国革命是怎样胜利的呢，是不是推翻了尼古拉二世的沙皇专制政权以后胜利的呢？古巴革命是怎样胜利的呢，是不是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以后胜利的呢？

这些独裁政权，也可以叫法西斯政权，当它们还存在着的时候，貌似都是很强大的，认为它们实际上不那么强大而且是必然灭亡的人，往往被另外一些人认为是“盲目乐观”的。归根结底，那些指责别人“盲目乐观”的人，只看到了法西斯的力量，只看到了反动派的力量，而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只看到了眼前一点东西，而没有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因而才把某些局部的、暂时的东西当作了不可更改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把本质上的纸老虎（局部的、眼前的“真老虎”）当成了永远的、打不死的神老虎。

实际上，世界上哪里有不死的老虎呢？

凡此种种，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并且已经为革命、反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反复证明是错误的，也将为世界人民的革命实践继续证明是错误的。

（原载《红旗太平洋》2017年3月8日）

## 再论法西斯——“泥足巨人”如何才能被击倒？

### 赤旗

近日读了红旗太平洋（以下简称“红太”）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及《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以下简称“现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等文章。双方就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影响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双方的争论你来我往、妙语连珠，一方倚靠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分析、旁征博引，另一方借重于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分析、数据充沛。很希望这一讨论能继续下去，我们可以继续学习。

《圣经·旧约全书·但以理书》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曾梦见一个巨大雕像，头是金的，胸和肾是银的，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但脚是半铁半泥的。后人们用“泥足巨人”来形容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列宁曾经用此来形容“帝国主义”。后续的左翼也经常引用此比喻。虽然早在 100 年前，列宁已经将帝国主义称为“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不过遗憾的是直到今天帝国主义仍然是“腐而不朽”与“垂而不死”，今天我们借用这一比喻来讨论关于法西斯主义运动。

帝国主义与两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与红旗太平洋）讨论的“法西斯主义”又是何种关系？如何才能真正打倒“泥足巨人”？

在进一步分析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历史上最著名与典型的法西斯政权是欧洲 1920 年代-1930 年代的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与纳粹德国政权，除此之外整个 1920 年代-1930 年代，欧洲、亚洲、美洲都有不少法西斯主义（准法西斯主义）政权以及政党和政治运动。因为“红太”与“现资”双方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德国法西斯的问题上，我们这里暂且以最成熟的纳粹德国法西斯政权为标本。

首先，我想问个问题，如果说“不是人民怕纳粹，而是纳粹怕人民”，为什么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从一个极右翼小党发展最终获取了政权？“正义的”人民为什么没有在法西斯上台前就阻止其掌握政权（当然也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是哪些主客观原因导致德国工人阶级和其政治代表（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无法阻止法西斯的崛起？

如果按“红太”的观点，是否意味着只有让法西斯上台，“正义的人民”再联合其他帝国主义力量击败法西斯主义才能证明“人民不怕法西斯”？我们是否该如此向今天的“人民”进行这样的宣传（事实上当初的德国共产党在宣言与行动上就是默认了这一定理）。如果不是，那么其中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历史教训）

### 纳粹是如何吸引“人民群众”？

纳粹党章（民族社会主义纲领 25 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Socialist\\_Program](https://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Socialist_Program)

第一条，我们要求基于民族自决的权利，联合所有德意志人组建大德意志国家。

第二条，我们要求德意志民族应与其他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废除凡尔赛条约和圣日尔曼条约

第三条，我们要求国土和领土（殖民地）足以养育我们的民族及移植我们的过剩人口。

第四条，只有德意志同胞，才能取得德意志公民的资格；凡属德意志民族血统，不管其职业如何，方能为德意志国民。因此犹太人不能为德意志国民。

第五条，凡在德国的非德意志公民，只能视为侨民，应受治理外国人法律的待遇。

第六条，只有德意志公民，才能决定德意志国家的领袖和法律的权力。因此，我们要求一切公职，不管何等种类，不管它是联邦的，还是各邦的，或是市区的，必须由德意志公民担任。我们反对腐败的议会制度，因为议会政治只根据党派利益，任用私人，而不顾及品德和能力。

第七条，我们要求国家应供给公民工作及生活为其首要任务。如果国家不能养育其全部人口，则应驱逐外国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国国境。

第八条，禁止非德意志人迁入德国。我们要求将 1941 年 8 月 2 日以后迁入德国的一切非德意志人应驱逐出

境。

第九条，一切德意志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每个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职责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个人的活动不许损害全体的利益，而应受全体的制约并对所有人有利。

因此，我们要求：

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

第十二条，鉴于每次战争都给人民带来生命财产方面的巨大牺牲，必须把战争横财看作对人民的犯罪。因此，我们要求完全没收一切战争利润。

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

第十四条，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

第十五条，我们要求大规模改组养老设施。

第十六条，我们要求建立并维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求立即将大百货商店收归国有，廉价租赁给小工商业者，要求国家或各邦在收购货物时特别要照顾一切小工商业者。

第十七条，我们要求一种适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项为了公益而无代价的没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废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机活动。

第十八条，我们要求严厉镇压那些危害公共利益得人；对于危险的民族犯罪、高利贷者、投机者等，不管其信仰及种族如何，必须处以死刑。

第十九条，我们要求用德国的教材代替为唯物主义世界秩序服务的罗马教权。

第二十条，为使一切有能力而又勤奋的德意志人有高等教育、并能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的机会，我们要求改革现存的教育制度。一切教育机关的课程设置，必须适应实际生活的需求。儿童一到有理解能力时，即应启发他们的民族观念。我们要求贫寒子弟特别优秀者，不论其父母职业及社会关系如何，应享有国家免费教育。

第二十一条，国家必须保护母亲和儿童，禁止雇佣童工，制定奖励体育运动和进行体格锻炼的法律，大力支持一切增进青年体力的团体，以提高国民的身体的健康水平。

第二十二条，我们要求取缔雇佣军，建立国民军。

第二十三条，我们要求制定法律，禁止恶意的政治谣言及其在报纸上的宣传。我们要求德意志机关必须做到：

1. 凡德文报纸的编辑及工作人员应为德意志公民。
2. 凡非德意志报纸，应经德国的特别许可，才能发行，但不许其用德文印刷。



3.凡非德意志人，而参与了德意志报纸的财政，或企图使德意志报受其影响，必须依法禁止，违犯者应关闭这类报社，并且立即驱逐与该报纸有关的非德意志人出境。违反公共利益的报纸，必须坚决取缔。

4.我们要求制定法律，坚决禁止对于我国人民生活有不良影响的艺术与文学，并封闭与此种要求相冲突的机关团体。

第二十四条，我们要求在不危害国家的生存，或不违背德意志民族的风俗道德的范围内，承认一切宗教、信仰的自由。

本党主张积极的基督教，但不为任何宗教所约束。

本党反对国内外的犹太人的唯物主义的。本党深信只有以“先公后私”为原则，才能致力于我民族的永久的复活。

第二十五条，我们要求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实现本政党所主张的一切；中央和国会对于整个及其各种机关，应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实施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应创设各种职业会议。

本党的领导者，誓为完成上述目的而奋斗，必要时，即牺牲征途，也在所不惜。

上面是纳粹党于 1920 年公开宣布的党章，也是其动员和发展的政治纲领。（我想每一个自认的左翼都该扪心自问，你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纲领，是否会为了认同其中的某些纲领，而默认其他纲领的存在？）

抽出其中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反唯物主义的与反对社会进化论的纲领，确实在经济上是相当“改良的”干预型资本主义纲领，但从来不能机械地、片面地和个别地看待这些“改良主义纲领”，因为纲领的要害之处则在于，界定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

其中只能见到“人民”而见不到“阶级”，阶级被“德意志”与“非德意志的”种族界限划分了，也就不再存在“自为的阶级”。“红太”的文章中屡屡提及的“德国工人阶级”事实上也遵循了纳粹的这一划分方式，将本来应该按照经济和社会阶级属性划分的力量，先以种族为框架界定。

个人不太赞同“红太”文章中所提及的“平均而言，德国无产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争爆发前确实是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

因为从来不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吃好了，喝好了，而是纳粹口中的“德意志日耳曼劳动人民”，这里的“平均而言”事实上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在种族与意识形态上不属于纳粹规定的“德意志日耳曼人民”的无产阶级群体已经彻底排除在外了。作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在这其中并不存在。

而且问题在于当纳粹真正上台后，纲领其中有益于垄断资本的条款都实施了，而真正有利于“中下层劳动人民”的条款，则掺水不少。譬如“第十一条，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废除利息奴隶制。”、“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收归国有。”、“第十四条，我们要求分配大企业的利润。”等条款早就被束之高阁，而为了与德国军官团和旧贵族阶层达成妥协，“第二十二条，我们要求取缔雇佣军，建立国民军。”也并没有贯彻，相反的是执政后德国纳粹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除了镇压政治反对派和“种族敌人”，还有就是彻底瓦解自己的“民族人民武装”冲锋队。

因为有 300 万之众的基层民粹的冲锋队已经蠢蠢欲动地提出“全面贯彻二十五条纲领”、“推动二次革命”、“没收金融资本”等口号；你可以说这是争权夺利，也可以说是对纳粹原教旨意识形态的镇压。（权力斗争与路线斗争很多时候必然交织在一起），“长刀之夜”对罗姆为首的冲锋队骨干分子和纳粹党内左翼派别奥托·斯特拉瑟（Otto Strasser）等人的清洗，标志着路线斗争和其中的政治结晶分子不是光靠封官许愿所能解决的。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而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如“红太”正确地指出纳粹党的发展和兴起确实是得益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而且在美国支持德国复苏计划的 1920 年代中期，纳粹党的实力实际是下降并日趋边缘化，而只有到 1929 年世界性的经济萧条爆发后，德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状态，纳粹党才得以问鼎权力。

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是 1920 年建立的纳粹党，不是 1918 年建立的德国共产党？为什么纳粹党的支持率能在短短三、四年间从不足百万选票跃升至六百万张选票？

任何政权的存在至少要取得广大的中间阶层的默许，无论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还是法西斯政权，而法西斯主义与一般资产阶级政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非一般的”条件下产生的。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其内生性不可克服的矛盾，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对外，表现为世界市场与私有制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张力越紧张，也越容易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对内，下层小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无法按照正常状况生存下去，垄断资产阶级也已经无力按照正常的统治秩序维持统治，这种情况下制度性的变革必须发生，既可能是进步的向前的革命，也可能是反动的向后的反革命。

面对内部的政治危机，只要但凡可能，资产阶级就能通过政变、军事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一般性对外战争的简单的上层外科手术方式来实现反革命。但是当阶级力量对比改变到已经无法采用国家机器进行正常与非正常的外科手术时，“礼失于朝求诸于野”，则不得不求助于国家之外的力量——群众，必须利用和动员严重分化已经对现行秩序绝望与彻底激进化民粹化的群众力量与群众运动来推行极端反动专制的暴力政策。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但社会阶层从来不是泾渭分明，在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中间阶层（事实上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与工人上层之间存在着广泛的通道），当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消灭旧的中间阶层时，也在不断产生新的中产阶级。

从这点出发，其实我并不赞同“现资”文章中“法西斯主义的面目是一场植根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借由法西斯政党，小资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股独立的力量走上政治舞台。”

的观点，因为小资产阶级从来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法西斯主义只是“小资产阶级幻想自己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纲领，他们不得不东拼西凑地从其他阶级那里抄袭他们的诉求作为自己的诉求，而这恰恰是“二十五条纲领”和所谓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来源，也因此纳粹党的“纲领”在其执政后无法得以真正贯彻。事实上，纳粹从成立之初起，其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左右翼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争夺。而且在当时，纳粹通过其内部的军方人员一直与德国军官团和贵族集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包括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也是这种联系的反应。

谁是所谓的“人民”？列宁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一句话“人民就是一个国家中不知道想干什么的那部分人。”他们如风向标般的随风摆动。“现资”的文章引用普兰查斯的观点，以证明小资产阶级是天然的纳粹支持者。在危机条件下，确实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会追随法西斯主义的步伐，但是前提是危机，而且是直接威胁到越来越多小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危机，才可能促使他们做出这一选择。

如果在“岁月静好的”资本主义正常时期（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小资产阶级更喜欢保守地维持现行秩序，更喜欢保留那“岁月静好的小确幸”。今天那些疯狂支持美国现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人民”的素描恰恰就是这群小资。所以特朗普本身还远远不是法西斯，因为特朗普为小资们提供的是缝补旧秩序的招魂幡（1980年代-1990年代的黄金美国）；只有当特朗普的招魂幡也不再管用时，小资对过去的“静好岁月”的期待破灭后，才会迎来要踢倒旧大厦的法西斯主义。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不是每个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都会成为希特勒，但每个被激怒的小资产阶级身上都有希特勒的因素。”只有在危机条件，只有彻底绝望的小资产阶级才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天然”群众基础，但即使他们所希望的也是在动荡岁月后能继续迎来秩序。

所以，他们如锅炉的气压阀释放着危机的怒气，如果被戴上眼罩却不知道该怎么走的狂马；他们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必须膜拜貌似尊严的秩序与跪倒在强者的鞭子面前，也从不吝惜拿自己的马靴踢打更弱者。

如果无产阶级作为“自为的阶级”的力量与觉悟足够强大，他们会跟着无产阶级走，历史上的众多工人起义与工农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强大，则他们必然会膜拜民族国家偶像之后怀揣金币的垄断资产阶级，并甘为垄断资产阶级欺压奴役无产阶级与他们自己的鞭子与马靴，所以代表着鞭子与马靴的法西斯主义成为他们可以崇拜的对象。

法西斯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在危机条件下动员小资产阶级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由于法西斯主义中所包含的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其往往表现出某些强烈的对大资本的反抗性，对现行统治秩序与统治当局的不满与挑战，所以在某些条件下其形式会与左翼的进步的反抗现行统治秩序有表面的雷同。

但极右翼民粹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希望小资产阶级牵着工人阶级的“牛鼻子”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后者则是以明确的阶级纲领引导小资产阶级跟随工人阶级的结晶体（先锋组织）推翻现行秩序。所以，这也不奇怪为何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与左翼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其名称、纲领、领导层甚至群众基础会有重合之处。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严重危机条件下，像墨索里尼这样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的重要编辑会成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魁首，为什么德国纳粹自称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并在党章中明确纲领提出要对大企业与金融资本实现国家管制等口号。

事实上，这也是在当时条件下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不过纳粹的干预资本主义政策注定是不可持续的。纳粹德国国债在战争开始前是 310 亿马克，而 1945 年已经达到 3370 亿马克。而且如果没有战争，当时德国的生产（特别是无效的军工与基础设施产出）总无法找到适应的需求，即使在占领大半个欧洲后，占领区仍然无法消化德国过剩的工业生产，而德国国内的农业生产能力不过是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准而已。

### 为什么德国劳动人民会跟随纳粹的“魔笛”？

当“红太”在文中提及“工人阶级”时，我个人更多理解的是，他描述的是一群满足于多分些黄油与香肠的民众，而非是作为“自为的阶级”的无产阶级，因为这群“无产阶级”好像对于其阶级兄弟们的命运的关心远不如对资本家的仇恨，即使其阶级代表（德共）被纳粹彻底禁绝，也与他们好像痛痒无关。

这又要回到“红太”和“现资”两文陷入的相同错误中，虽然他们在表述方式正好相反，但其实其内在逻辑是相同的。

“红太”在文章中几次提及纳粹德国的国家干预的经济扩张和战备政策本身“是对工人阶级的妥协”，但这是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妥协吗？恰恰不是。在个人看来，更确切的说法是利用对外军事扩张，对内政治压迫与种族主义政策，从而收买一部分“日耳曼小资产阶级与工人”而已，这时阶级力量已经发生变化。就如同我们不可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军队视为“工人阶级”的阶级力量（只有当他们被感召起义，站到工人阶级这边后才能发生变化），我们也无法将被物质收买和种族主义理论毒害的普通群众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

反动保守的意识对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分裂与侵蚀是极其有害的，而且类似以种族与性别进行分化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也是意识干预社会存在的具体反映。美国的《排华法案》事实上就是在美国白人资产阶级对工人分而划之的重要手段，而作为白人工

人团体的劳工骑士团为《排华法案》的通过出力不少。而纳粹通过宣传种族优化论、性别差别论等反动保守主义思潮，将广大女性从社会劳动中排挤出去（鼓吹妇女的战场是“产房”，女性的工作场所是厨房，相夫教子是日尔曼女性的主要工作，由于这一意识形态是统治的重要手段，即使在二战德军严重缺乏劳动力资源时，纳粹政权也不愿意轻易动员女性参与军工产业与国防工业）。将犹太人、吉普赛人、其他被歧视种族，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关入集中营，既空余出一定的社会工作岗位，又可以获取免费的劳动力。纳粹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与反犹太计划是在上台前早已公然宣布，而且在 1933 年上台后就开始逐步贯彻，其中包括 1933 年开始建立的达豪集中营，对经济运营体系的“日耳曼化”。

至于其他战时经济对欧洲其他占领国和从属国的经济掠夺，“红太”的文章中其实也有提及，我们就不一一类举，即使同为“日耳曼民族”的挪威，在战时被德国纳粹无偿掠夺的经济收入高达经济总量的 20%-40%，上千万外国劳工与遍布整个欧洲的集中营奴役劳动，以及数百年来数百万犹太人积攒的财富（这一财富掠夺是以种族为基础，而不是以阶级为标准，百万犹太人中绝大多数不过是普通的工农与小资产阶级而已）。

因为在“红太”的话语体系中，数十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等种族与政治异议分子，并不在其“工人阶级”的范畴；而且“日耳曼工人”多分得的黄油与面包，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是以牺牲其基本民主权利和阶级觉悟为代价，失去了自己的阶级政党、工会组织。妥协是斗争的产物，而这一收买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利。

罗马帝国为维持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体系的霸权统治，也曾经对罗马军团士兵进行了丰厚的收买，而且当时罗马帝国的收买至少还不以种族为标准，就如同今天美帝国主义对国内士兵的收买一样。

虽然“现资”的文章中，“阶级斗争的路线和结果并不是被生产力发展水平所直接决定的，而是有着独立的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两个因素——政党和意识形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基本描述是正确的，但其显然过于强调所谓阶级意识形态的独立作用，而且把先锋党和组织作为一种外在凝固剂，而不是工人阶级自身产生的政治结晶，事实上也很遗憾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时，其影响不仅仅在于对法西斯的崛起，也在于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反动思想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侵蚀。为什么在 1920 年代-1930 年代的德国，德国共产党没能战胜纳粹，是谁阻碍了这一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恰恰是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本身。

当时德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命令下（第三时期），一直将社会民主党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而将之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宣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莫洛托夫在宣布“我们已经双脚迈进了第三时期……只有愚顿的机会主义者、可悲的自由主义者”才看不到这点。但事实是，1929 年的危机条件下，1930 年德共的选票从 300 万张增加到 450 万张的同时，纳粹的选票数从 80 万张增长到 600 万张。如果说，同样都是在挖社会民主党的“墙角”，显然德共“挖墙脚”的功力远不如纳粹。

1931 年，德国纳粹为了推翻在普鲁士州（德国最大的州，也是首都柏林所在的州）统治达 12 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呼吁进行全民公决。最初反对该公投的德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与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将这场公投称为“红色公投”，当德国共产党事实上与德国纳粹建立起“统一战线”以反对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斯大林的第三国际将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我们看到的是整个激进化的德国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两者相合是德国劳动人口的绝大多数）作为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彻底混乱到最后的无所作为而土崩瓦解。虽然那场“红色公投”，最终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掌握普鲁士州的工会和工人阶级对纳粹的警醒未能得逞。



如托洛茨基记载，就在公决前夕，德国共产党《号角报》头版上刊登着这样的文章：“那些在世界战争中为自由德国而捐躯的死者事业被背叛了，叛徒们现在跑出来反对人民革命，反对革命解放战争。”此处的“自由德国”所指的就是参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也包括前第二帝国。“阶级”被“人民”的概念所替代，“阶级国家”被“民族国家”所替代，法西斯要“打倒凡尔赛和约”，我们也要“打倒凡尔赛和约”。

由于德共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敌对为纳粹争取中下层群众提供了良机，正是因为这一放弃核心阶级话题的政治原则上的错误才是导致纳粹得以在危机的泥泞战中胜出根本原因。这其中作为资产阶级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也需要承担相当的责任，但由于本文主要以德共为标本，因为德共是无产阶级工人政党，而且一直以明确的阶级革命为口号；德社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一战前就已经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而将自己的命运定位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之内，社会主义的目标早已被放到不可知的未来。确实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阶级立场与软弱无能，为德国纳粹政权铺平了道路，但是德国共产党战略性的错误和其官僚集团的自私帮助纳粹缩短了夺取政权的道路。

1932 年魏玛共和国兴登堡（Von Hindenburg）总统任期届满，需要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希特勒代表民社党，台尔曼代表德国共产党参选，最终，兴登堡以 1936 万票（占总票数的 53%）当选，希特勒获 1341 万票（占总票数 36.8%），共产党候选人台尔曼获得 370 万票（占总票数 10.2%）。7 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 1374 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 37.4%，在国会 608 个席位中拥有了 230 席，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而直到此时，莫斯科和德共的机关报仍然在鼓吹“希特勒上台”之后，是“台尔曼的胜利”。

当时，纳粹党与德国垄断资本集团达成幕后协议，1932 年前只有少量资本家明确支持纳粹党，而在希特勒等人反复向资本集团保证其利益时，1932 前后为帮助纳粹选举，来自资本集团的捐助源源不断地进入了纳粹党的金库，其中包括克虏伯、法本、钾碱工业、吉

尔道夫和科隆银行等大联合企业和老牌资本家，绝大多数右翼与中间力量都臣服；由于德国社民党与德国共产党的错误，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开始处于战略退势并丧失斗志。

当 1933 年兴登堡委托希特勒组织内阁后签署了《国家紧急法》，纳粹蓄意制造“国会纵火案”，全体共产党议员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议员被拘留剥夺作为国会议员的权利，被正规警察所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有 3000 多，许多人被投入集中营，还有不少人惨遭杀害。1933 年 3 月 3 日，德共领袖台尔曼被逮捕，被关入集中营后 11 年，1944 年遭处决。所以纳粹并非如某些人宣传的依靠“民主选举”获取了政权，仍然采用了直接的暴力手段。

1935 年 3 月 5 日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共产党获得了 484.8 万多张选票，占总票数的 12.3%；社会民主党得到 718 万 1 千多张选票，占总票数的 18.3%。两党共得选票 1200 万张，占总票数的 30.6%。纳粹党所得选票从 1932 年 11 月的 33% 增长到 44%，但仍然未获绝对多数，在国会中只占有 288 个席位，没有超过半数，只有加上德意志人民党的 52 个席位，在国会 647 个席中才构成简单多数。而这时无论是德国共产党还是社会民主党都已经无力回天。

德国共产党当时为了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而放弃了其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放弃关系其作为阶级政党的真正核心话题——阶级话题，追寻着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脚步，用相同的德意志民族、羞辱感等概念妄图去收买中间阶层，也使群众越来越难以区分德共的核心诉求与纳粹的核心诉求到底有何不同。与以种族主义和野蛮专制主义为依归的对手较量有害的民族主义鼓吹，那德共就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乞丐与龙王比宝”，放弃阶级话题，工人阶级的政党将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当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能说服了一部分群众之后，也就转化为其物质力量。种族理论的兴盛压倒了阶级理

论。法西斯主义确实是“泥足巨人”，但“种族主义”理论恰恰是其用来护腿的凝固剂，如果无法用阶级理论击败种族主义理论对于群众的侵蚀，其自然能做到貌似可怕的“金刚不坏”。我们要记得直到 1945 年战败，德国国内并没有发生过一场广泛的群众性反对法西斯统治的运动。

所以社会存在同样也受到社会意识的反作用，现实政治斗争，既非是教科书般数据与定理的线性反应，也非是完全真空意识形态的作用。今天当我们讨论历史教训时，以其名称呼其实，不可将不同性质的力量和运动混为一谈，恰恰需要记住回到核心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对比”话题。

最后，非常感谢“红旗太平洋”与“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在风云变幻的今天，重拾上世纪初法西斯主义运动兴起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性惨败的这一话题，因为其对今天的现实分析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 另附：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是否是法西斯政权？

虽然在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力量在宣传中也曾称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为是法西斯政权，例如周恩来在 1943 年写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中称为法西斯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也并不以此作为主要宣传口径。

蒋介石统治集团具有某些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蒋介石本人也曾试图效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复兴社等组织是具有法西斯主义纲领与倾向的政治组织（但其对政权的整体决策影响有限），但我个人以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不是法西斯政权（套用一句网友的话，你也配叫法西斯？），当时中国社会人口大多数以小农社会为基础（佃农与地主存有一定依附关系），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力量并不发达，由于作为半殖民地在对外政治经济政策上仍然需要依附西方“正常”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蒋介石政权的任何时期，虚有其表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和最终目标仍然存在（法西斯主义则是彻底藐视“民主形式”那些东西），

所以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并不是法西斯主义政权。法西斯政权必然是军事独裁政权，但并不是所有的军事独裁政权都是法西斯政权。

而且 1945 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无论是美苏等大国都支持这一停战与调停，这岂非是说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法西斯主义政党执政的条件下分享政权？

（原载《红旗太平洋》2017年3月16日）

同志，咱们聊聊怎么给资本主义挖坟

### “装甲巡洋舰曙光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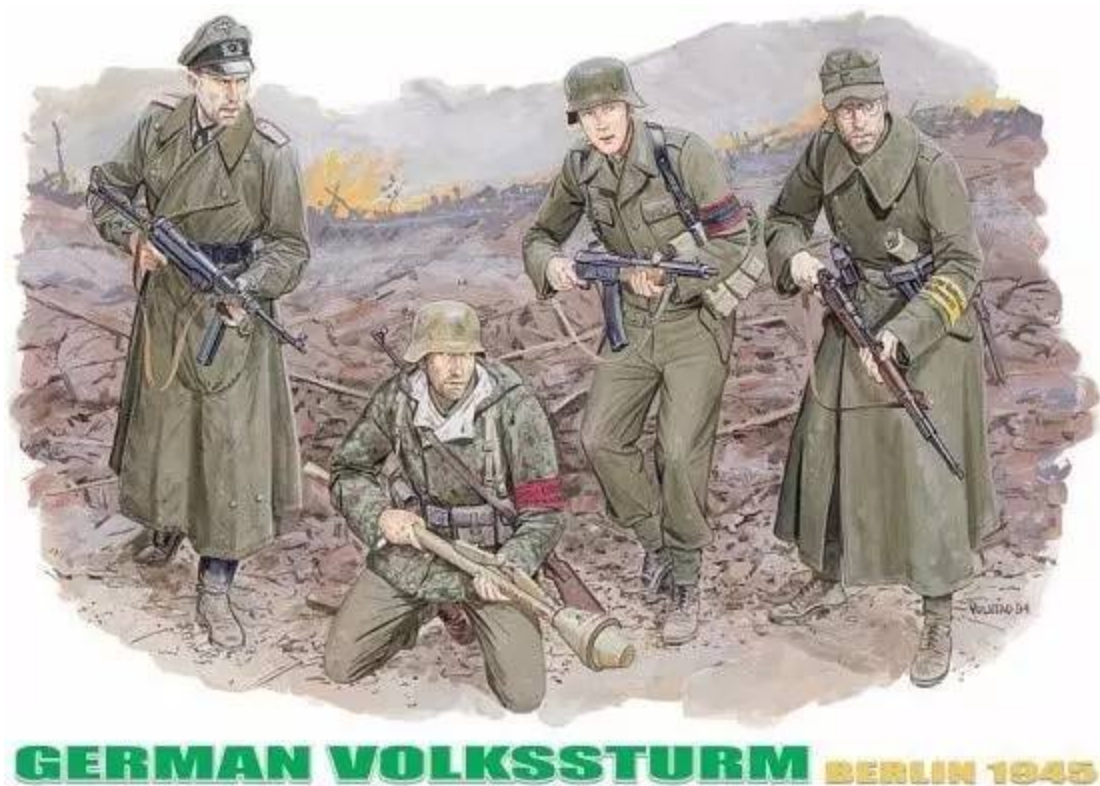
前几天，“红旗太平洋”发布了赤旗同志的《“泥足巨人”如何才能被击倒？》。该文内容丰富，讨论了许多我们在从前的辩论中未能深入讨论的问题。简单来讲，赤旗同志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垄断资本在危机条件下动员小资产阶级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由于当时受到第三国际影响的德国共产党抛弃了“其作为阶级政党的真正核心话题——阶级话题”转而诉诸种族话题而最终失去公众支持。在文章中，赤旗同志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赤旗同志讲，在曙光号的两篇文章中，他并没有看到“自为的无产阶级”的德国工人，相反，只看到了“一群满足于多分些黄油与香肠的民众”。而对于赤旗同志来讲，不去说“自为的无产阶级”，就意味着“遵循了纳粹的这一划分方式，将本来应该按照经济和社会阶级属性划分的力量，先以种族为框架界定。”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先来谈谈赤旗同志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然后再来探讨“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话题。最终，我们会谈到无产阶级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 曙光号在前两篇文章中表达了什么观点？

“装甲巡洋舰曙光号”的两篇文章想要说明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法西斯政权并非全知全能的妖怪，它是可以分析，也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挫败和摧毁的。第一篇文章《纳粹德国都那么怂，你怕个什么法西斯？》指出了即使在战争时期，德国民众的消极或积极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自身的派系倾轧会严重削弱法西斯政权的力量，这是导致纳粹德国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篇文章《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主要是反驳“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转载张跃然文章中的“意识形态而非经济基础造就了法西斯”的观点。文章指出了法西斯上台的必要条件：至少暂时地解决了资本主义面临的矛盾。其中，缓和阶级冲突（收买

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以及挽救利润率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法西斯政权的行为被限定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不能为所欲为。



装备低劣,缺乏训练的德国人民冲锋队,柏林战役,1945

“装甲巡洋舰曙光号”认为,张跃然文章的问题在于,把本来可以分析的法西斯政权的性质和行为,用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打包成了政治哲学,或者准确的说是“政客技术学”的诡辩,又搞成了吓唬小孩的童话。“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评论的问题在于,在没有仔细阅读文章和研究历史的情况下,将“红旗太平洋”文章中对法西斯政权弱点的分析当成了“盲目乐观”。

因此,“装甲巡洋舰曙光号”并没有试图具体回答为什么战前的德国人民未能阻止纳粹上台的问题,只是回答了纳粹不可能纯粹是用意识形态欺骗手段获取政权的问题。这就引申出了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思考。

## 纳粹德国是怎么收买德国工人的？

法西斯政权为什么要从物质上收买工人？如果不收买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法西斯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只要工人的工资不被压低到致使工人阶级无法正常生活，从而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受到严重威胁的地步，**资产阶级总是乐意压低工资的**。如果资产阶级能够维持自身统治且不需要向工人做出物质上的妥协，那么没有理由设想资产阶级会大发善心去用本可成为利润的收入“割肉”，收买工人。**收买工人本身就说明了资产阶级迫于工人的斗争势头，不得不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作出一定妥协的事实**。这说明了，即使是主要来源于“自在的无产阶级”的，并不是很进步的经济斗争，都有能力迫使法西斯政权在战前，乃至战时动用自己有限的资源去讨好的现实。

赤旗同志认为，纳粹德国对工人的收买是以压迫少数群体为代价的，是“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长子继承权”。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赤旗同志列举了长刀之夜对原冲锋队领导阶层的清洗。不错，纳粹党领导机关确实“抛弃”（尽管他们从来没打算实行“二十五条纲领”）了其原教旨的意识形态，但是它并没有展开对普通冲锋队员的清算。相反，再后来急速扩编国防军的过程中，大部分冲锋队员被吸收了进去，成了基层骨干士官和军官，在波兰战役中，还有冲锋队与国防军混编作战的情况。同样，对于原先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除领导层基本被消灭以外，大多数的普通支持者也没有被投入集中营，从而被剥夺成为“日耳曼劳动人民”的权利，而且还让其中的许多人加入了吃皇粮的国防军。例如，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之前，冒死游过布格河把情报通报给苏军的德军工兵，就是原共产党员。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 1933 年至 1939 年间，许多犹太人，共产党员和吉卜赛人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他们中的部分人还被投入强制劳役。这当然是灾难，但是，我们不能撇开数量去谈整体。在 1938 年以前，尽管纳粹党通过一系列法案抵制犹太工商业，各地也多有暴力伤害事件发生，但是大规模有组织的将犹太人，吉卜赛人和政治异见分子投入集中营则是

1938 年水晶之夜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德国资产阶级在不依赖强行压榨这些人的条件下已经成功对工人进行了收买。根据各方资料，直到开战之前，德国集中营在押犯人总数应该不超过 20 万，即总人口的约 0.3%，而且，根据大屠杀百科的解释，在战前，集中营的强制劳动“多数是毫无意义的”，即多数是非生产性的，所以直到 1939 年，集中营的惩戒作用要远大于压榨作用，而德国统治阶级能从集中营里榨取的剩余产品，对整个劳动力来讲微乎其微。所以，要说有没有强制劳役，有，是否残酷，残酷，但是如果说德国工人阶级用牺牲共产党，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方式来自肥，显然是忽略了基本的数量级关系。

### 没有胡萝卜，就可以随便舞起大棒吗？

赤旗同志认为，在危机时刻“垄断资产阶级也已经无力按照正常的统治秩序维持统治，这种情况下制度性的变革必须发生，既可能是进步的向前的革命，也可能是反动的向后的反革命。”“面对内部的政治危机，只要但凡可能，资产阶级就能通过政变、军事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对外战争的简单的上层外科手术方式实现反革命。”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前两篇文章中所论述的，“通过政变、军事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般性对外战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而采用的，如果无法哪怕是暂时的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困境，那么靠这些手段上台的某些资本集团的代表也会被踢下台。如果说墨索里尼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意大利 20 至 30 年代的积累危机，那么在 1943 年夏，当他的战争投机失败，北非和西西里全部丢失，眼看着以往的成果付诸东流之时，资产阶级的其他集团就会用同样的政变手段把他收拾掉。抽象的讲，革命和反革命都可能发生。但是，不存在为了革命的革命，也不存在为了反革命的反革命，革命与反革命行为都基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矛盾，而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本身的产生，从根本上讲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特殊时代和国家中的产物。

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矛盾去谈阶级，力量对比，就会把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变成阶级的“政客技术学”。为什么说是“政客技术学”呢？因为在这种叙事中，资产阶级只要套上法西斯的面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小到书报检查，大到把大量人口投入集中营的方



式来打击革命力量，而不用担心自己所使用的专政机关是否忠诚高效，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去养活军警、官僚和收买部分民众。相对的，作为革命政党，仿佛只要加强领导，强化组织，采取正确策略，就能在无论何种条件下都能把“自在的无产阶级”转化为“自为的无产阶级”，从而实现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是仿佛无所不能的资产阶级国家，另一方面是只要路数对了就同样无所不能的革命党，这显然是唯心主义。

### 什么是“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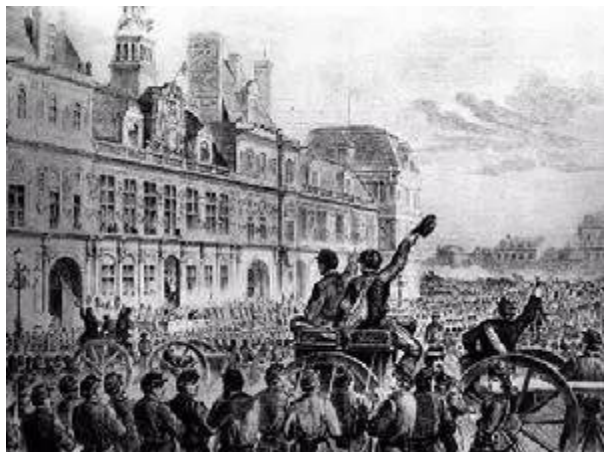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考察工人区，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在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一般是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者，即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且不受人身依附关系束缚的雇佣工人。“自在的无产阶级”指的是经济上是无产阶级，但是尚未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的人，他们身处资本主义剥削之中，但是并不清楚为何如此。这一类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主要是经济斗争，如消极怠工，经济罢工，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缩短工作日和改善工作条件等。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自在”理解为“自己存在在那里”。在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要求并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最多只能在分配领域争取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妥协，同时，这一类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性较差，更多地体现出散漫性甚至是盲目性（如认为机器是万恶之源，所以砸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自为的无产阶级”指的是充分认识到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彻底实现解放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所以，一切阶级斗争的方向都是推翻资本主义。与其思想认识相适应，这些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更加激进，主要包括政治罢工，策略性的参与资

产阶级民主以及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等，其组织形式也更加严密而强大，其典型形式就是以列宁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各国共产党——职业革命家集团。简单地讲，“自为”，就是“为了自己，成为自己”的意思。

从表面上看，“自为的无产阶级”当然比“自在的无产阶级”更强大，更觉悟，更接近理想世界中的无产阶级形象。或许是根据这一点，赤旗同志认为“我们也无法将被物质收买和种族主义理论毒害的普通群众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但是，我们能忽视“自在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自为的无产阶级”身上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两类无产阶级的关系。

### “自为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



“自为的阶级斗争”的典型代表，巴黎公社

赤旗同志认为，“装甲巡洋舰曙光号”的论述里，“作为自为的“无产阶级”并不存在。”那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自为的无产阶级”进行有效斗争的条件。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我们当然不能教条的理解这句话，坐等资本主义自己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而自行瓦解。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自为的无产阶级**”能够展开有效斗争的时

期，往往是资本主义遭遇了至少是暂时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时期。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危机将世界人民解放运动一度推到了顶点。那么，什么是“至少暂时无法解决的矛盾”呢？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风向标是利润率，如果利润率崩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微观基础——为追逐利润的生产就会瓦解，从而产生危机。尽管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诸如新自由主义的直接打击工人运动，或者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政策，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掠夺政策来缓解，但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是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的。

在二十世纪及以后的条件下，从长期来看，一国资产阶级想要恢复利润率，除需要一个能够基本正常运行的政府外，至少需要下述三个条件中的一个：1、快速的技术进步；2、有现成的自然资源可供掠夺；3、有大量的、具备一定素质的剩余劳动力可被剥削。简单地用做蛋糕和分蛋糕来比喻，就是 1、把蛋糕做大；2、搞到更便宜的面粉和奶油；3、用新劳动力压制现有劳动力的工资，争取分到更大的份额的蛋糕。其中，条件一保证了资本家提高利润率的同时，实现工人实际工资提高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的问题用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双赢”战略的历史条件。在经济学上，这通常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条件二指的是资本主义对自然界加紧掠夺的趋势，其起到的作用和条件一类似。条件三是历史上任何能够较长期的压制工资的资产阶级国家所必须的条件，剩余劳动力要么从乡村中获得，要么通过外包，或者殖民扩张获得。如果这三个条件都不满足，那么凯恩斯主义国家会由于剩余劳动力耗尽陷入“利润挤压”危机（我们稍后会论述到）；新自由主义国家会由于找不到替代劳动力而无法有效打击工人；法西斯国家甚至连“用大炮搞黄油”的意识形态都难以形成，因为一来用大炮搞的黄油未必便宜（自然资源耗尽），二来别人也有大炮（军事扩张风险）。

当这三个条件难以满足时，利润率就无法得到恢复，资本主义就会陷入长期停滞和混乱。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的结果。由于

生产资料私有，所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同时是剩余价值（这里指一般意义上的利润，不作具体区分）生产过程，而劳动过程不能带来剩余价值时，劳动过程就会停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作为没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使用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参与生产过程，当劳动过程停止时，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回到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的状态继续生活下去。当这一矛盾发展到白热化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就已经“发挥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就无法容纳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此时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灭亡将是大概率事件。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自为的无产阶级”才会大量的产生出来，这不仅仅是因为革命政党的宣传工作，而根本的讲是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活现状已经不可持续，而且无法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调整来解决。只有当至少是无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拥有这种历史体验时，才有可能使这个阶级的多数成为有阶级觉悟的自为阶级。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实现自发性与自觉性的统一。在历史的和现实的斗争中，我们所接触的，多数不是理想情况下的“自为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谈恋爱，一个谈不成就再换下一个，进步同志真正需要做的不是在人群中甄别谁是纯血统的“自为无产阶级”然后展开工作，而是要承认绝大多数斗争都是以经济斗争为核心的“自在的阶级斗争”，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改造自己的认知。

### “消费不足”危机与瘸腿的“正义”性

“自在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根据上文阐释的，我们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遇到的“无产阶级”的形象，多数是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混合。在资本主义正常运行或者有能力解决危机的时期，其自在成分明显一些，阶级斗争可能集中在分配领域，表现为争取高工资，高福利，短工作日和良好工作条件；在资本主义出现重大危机的时期，其自为成分则会更加突出，阶级斗争的焦点则会逐渐转向生产资料所有权，最终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向争取政权的斗争。我们知道，能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性一击的当然是自

为的阶级斗争，但是自为的阶级斗争的广泛发生却是以资本主义危机为条件的，因此，我们就有必要问这样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危机乃至灭亡和无产阶级是什么关系？

在 19 世纪的历史现实和第二、第三国际的理论中，经济危机的典型形式是所谓的“消费不足”危机。这种危机是指资产阶级过分剥削工人导致工人阶级工资过低，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严重不足，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不得不最终依赖工人阶级的消费来实现其剩余价值，因此，大量的商品因为找不到买家而被迫囤积，资本家因为赚不到钱而停止投资，最后发生投资-利润连锁崩溃，导致危机。

历史地讲，这种危机形式集中出现于上世纪 30 年代以前，二战之后的历次危机并没有明显呈现消费不足危机的特征。从阶级斗争的现实来讲，“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给我们指出的是这样一条道路：**工人阶级因为受到剥削，一直挨打，反复失败，导致绝对的和相对的贫困化越发明显，最终绝地反击，打败资本主义。**不能不说，这与至今存在于广大工农群众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心里的朴素的正义观不谋而合，这种观点认为，工人阶级是因为受苦受难才有了革命的合法性，资本主义不断剥削工人正是其一切“罪恶”的源泉。**这种观点看似一气呵成，大旗高举，但却是天生瘸腿的。**

设想，如果无产阶级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迫使资本家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以至于至少在某些国家出现了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上升，实际工资乃至工资份额持续上涨的情况，那么革命岂不是失去了“正义”性？既然失去了“正义”大旗，那么“自为的”阶级斗争又如何谈起？在传统的“消费不足”危机理论代表的革命路线中，存在着一个断层：它只能解释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可能如何爆发，但是任何革命的成果都会削弱革命自身的“正义性”。本质上，这种指望人民群众，越被压迫越革命，被压迫到极点然后反戈一击的革命理念，是许多小资产阶级左派知识分子的通病，一方面，看不到自在的阶级斗争的成果和力量，以及其在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难以静下心来去研究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新形态；最后，总是将希望寄托在自己有生之年（最好是青年时代）能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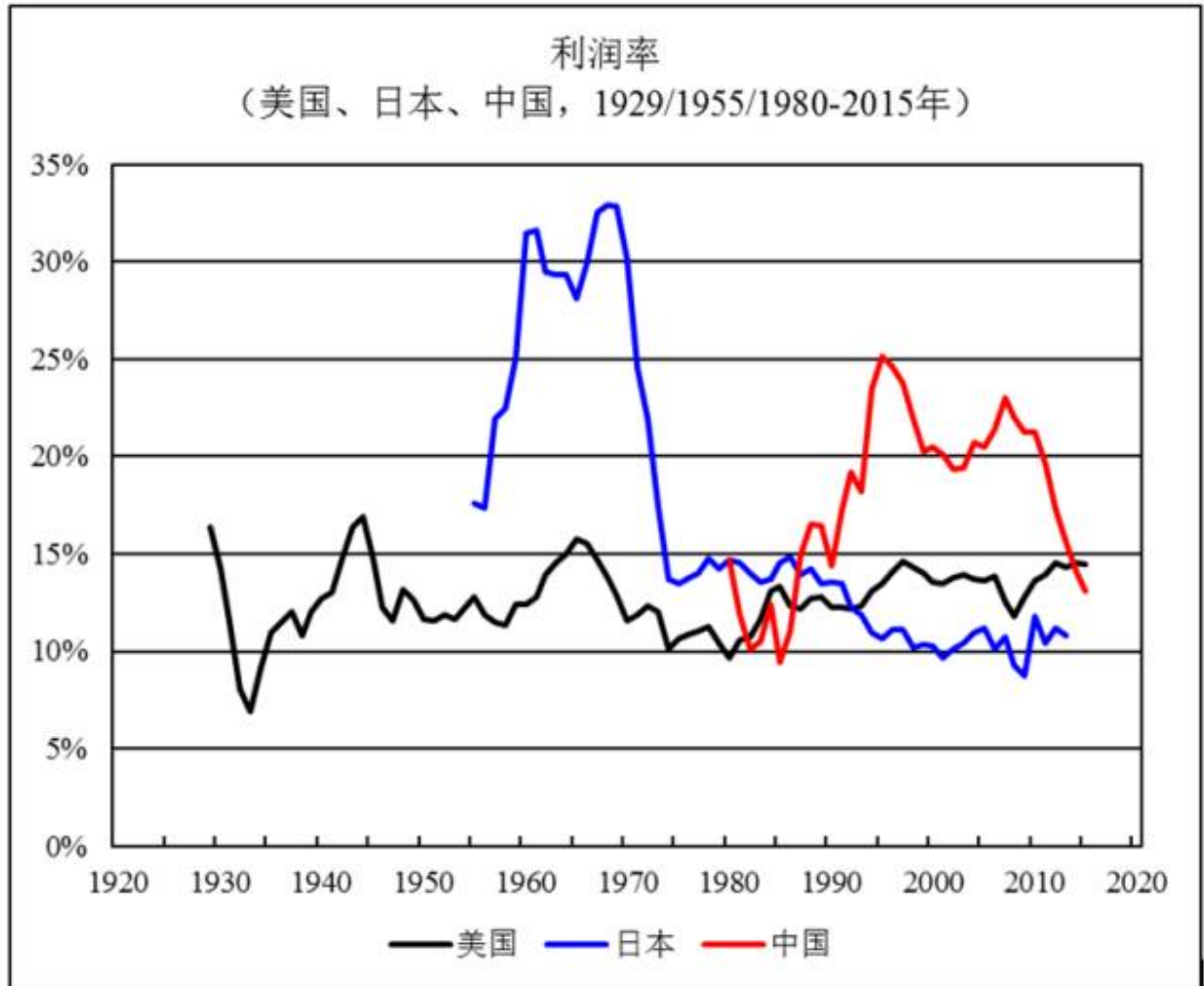
振臂一呼，天下劳苦大众就能云集响应，瞬间消灭敌人。这种路线有情感而无理论，有冲劲而无战略，集中表现为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越压迫越革命”，那么压迫了还不革命怎么办？一位长期从事进步青年教育的老同志曾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许多左翼进步青年有一种“救世主”心态，认为自己是来拯救劳苦大众的，因此，自己的使命就是教育、鼓动和领导他们。当现实的民众不符合他们自己的设想时，就要鞭策民众。但是，现实情况与他们自己的设想之间总是有很大的差距，当“自在的阶级斗争”总是不能如他们所愿转为“自为的阶级斗争”时，他们就会产生极度沮丧的心理，轻一点的会怀疑革命理想，**严重一点的，会把这一切的“罪过”都甩到群众头上，认为“这种人也配被我拯救？”**。本质上，这些同志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整天想着的东西**不是结合人民的实际需要去推动群众运动，而是根据自己的设想去“运动群众”**，遭受失败以后又不重新审视自己的问题，结果怪这怪那，最终彻底放弃进步理想。

另一个问题，“越压迫越革命”，那么不压迫就不革命了？当阶级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果，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有所减轻时，“越压迫越革命”的思想就会出现问题。首先，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消费不足”，那么只要资本家对工人做出适当的让步，让消费“足”了，那么资本主义自然就万事大吉了，而资本主义危机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同样也不存在了。于是，这些同志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宣传阶级剥削加重，这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要么接受现状，与资本家妥协。所以，“越压迫越革命”事实上是一个改良主义的陷阱。

### **“利润挤压”危机与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理解 1、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趋势与当今时代危机的特点；2、“自在的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



美国、日本和中国的利润率数据来源：美国、日本、中国的官方统计网站

二战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趋势，往往表现为，经济高涨时期企业迅速吸纳失业人口，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大大缩减，无法对已经被雇佣的工人形成压力。此时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工资问题，工人凭借着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和以往斗争形成的组织，以及迫使资本家让步而得以实现的劳动保护立法，争取更高的实际工资。在工人的斗争使实际工资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时（这正是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最为恐惧的事），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就会上升，利润份额就会下降，当利润份额下降且产出资本率无法抵消其影响时，就会出现利润率的绝对下降。由此引发的利润率-投资双重崩溃就是所谓的“利润挤压”危机。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利润挤压”危机与“消费不足”危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是因为无产阶级斗争力量太弱，而前者是因为太强。在“利润挤压”危机的语境中，正是工人的经济斗争，而非资本家本身的“贪欲”，一次次打破资本积累的条件，造成一次又一次危机。当然，这种说法显然会受到一定的道德谴责。例如笔者在协助编写经济危机部分的教材时，曾看到过 80 年代国内学者对“利润挤压”危机的看法。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显然是把经济危机的罪过都推到了工人的头上。不过，我们仔细想想，就算是工人斗争引起危机又能如何？**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那么，如果掘墓人不主动帮资产阶级挖坟，难道还要等资产阶级自掘坟墓不成？既然资产阶级怪我们添乱，那就大大方方地承认我们就是来添乱的。**而且不仅仅是添乱，还要彻底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的阶级社会。

以上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基本特点，那么长期趋势又如何呢？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平均来讲是逐渐上升的，这并非资本家大发善心，而正是无产阶级不断争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结果。尽管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导致工人运动受到打击，但是真正发生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全面倒退的，只有部分拉美国家和前苏东国家。发达国家尽管出现了实际工资停滞的状况，但是战后黄金期的斗争成果大部分保存了下来。至于承接国际资本转移的国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大量人口脱离生产资料，成为无产阶级。迅速的无产阶级化带来的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甚至使得台湾和韩国的军事独裁政权先后放弃了此种统治方式。而在近年来无产阶级化最为迅猛的中国大陆，不仅出现了连续 30 年实际工资上涨的局面，而且从 2010 年起，工资份额也开始上涨，至 2014 年，中国工资份额已经超过了 90 年代初大规模私有化之前的水平。同时，中国的利润率也开始下跌。这些现象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消费不足”来解释的。



事实上，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胜利的、以经济斗争为主要表现的“自在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够积攒足够的经验应对未来更复杂的斗争形势，同时，也正是“自在的阶级斗争”一步一步套紧了勒在资产阶级脖子上的绞索。所以，尽管大规模私有化以来，劳动人民“吃了二遍苦，受了二茬罪”，但是这些都不是白给的学费。从上面的数据看，现在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战略机遇期”和资产阶级的“战略进攻阶段”已经结束。经过了二十年资本主义洗礼的“自在的无产阶级”，“滚大了，打精了”，学会了丰富的斗争策略，这一切将为未来大规模有组织的“自为的阶级斗争”提供土壤。

所以，今日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趋势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让占人口比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势必展开争取更高待遇的经济斗争，当经济斗争压低利润率，导致某些关键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持续时，就会砸碎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链条，从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引起混乱，当资本主义的各个集团无力恢复利润率时，资产阶级国家能力就会显著弱化（我们将另外撰文讨论这个问题），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窗口。

所以，无产阶级不是因为挨打，再挨打，不断挨打而占领道义制高点，用自己的“圣徒”形象“否定”资本主义的“非人格特征”。相反，无产阶级是通过斗争，再斗争，不懈斗争而压迫利润率，搅乱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用自己的实际力量战胜资本主义。面对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正确思想不是“求你别打我”，而应该是“打的就是你”。在资本主义尚能解决矛盾时，积极防御，保存斗争成果，积极给资本主义捅刀子、抡闷棍、打黑枪，让资产阶级疲于奔命，为下一次进步浪潮做准备；在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矛盾时，抓住机遇，主动进攻，争取一国或数国的首先胜利。

## 参考文献

大屠杀博物馆网页：<https://www.ushmm.org/learn>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李民骐、张耀祖、许准、齐昊：《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政治经济学》

（原载《红旗太平洋》2017年4月3日）

## 面对法西斯，决不可掉以轻心

郑梓岩

**红旗太平洋编者注：**近日来，“红旗太平洋”公众号陆续发布了多篇讨论德国法西斯的文章。“装甲巡洋舰曙光号”认为，“即使在战争时期，德国民众的消极或积极的斗争，以及资产阶级自身的派系倾轧也会严重削弱法西斯政权的力量，这是导致纳粹德国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及“法西斯上台的必要条件是至少暂时地解决资本主义面临的矛盾”。“赤旗”认为，必须区分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警惕“种族理论”压倒“阶级理论”的危险。这些文章引起了读者朋友们的热烈反响，其中一位热心读者针对“装甲巡洋舰曙光号”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商榷意见，非常有价值，故本公众号将这些意见整理成图文消息，供大家继续探讨。

1. 同志，我有话直说。首先，小资和工人有没有在纳粹政策中获益？张（跃然）引用的著作是英文，我不方便查阅，稍做了中文文献检索，查到 1985 年 6 期《世界历史》许琳菲等人论文，指出所谓减少失业实质是半军事强制劳动，工人实际工资降低，中小企业税负增加，通货膨胀使持有国债的小资受到剥夺，大量小企业受垄断资本吞并，我认为张跃然同志的分析没有错误。

2. 即使他的分析错了，过于强调了纳粹意识形态宣传对德国小资的蛊惑作用，没认识到实际经济利益的作用，这位曙光号同志抨击他”新自由主义学术官话“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怎么就新自由主义了？如果因为认识不同，意见不同，就没有根据地扣同志帽子，就是“唯我独革“的表现，很容易破坏团结，是要好好反思纠正的，这与张（跃然）错不错无关。张不回应你们批评，你们大可以认为他认输了，但我作为第三方，我认为就事论事可以（泥足巨人那篇就是就事论事的态度），扣帽子就错了。我认同张的观点：具体历史事件中，某一阶级确实可能会因为意识形态宣传而支持有损自己阶级利益的一方，比如这些德国小资。我反对有的同志认为的，对民族主义泛滥不用担心，受到剥削小粉红自然就觉悟。当然，这根本不影响长期来看，阶级经济利益会比意识形态忽悠的作用更大，张也提

到了，小资之所以容易被忽悠，也是因为其阶级利益使其不敢抛弃私有制。最后，即使我和张的认识不对，那这（种认识）对工人阶级实践的危害，如果有，也不可能达到与新自由主义相提并论的程度。总而言之，如果你们也觉得这是扣帽子，是错的，那最好表示一下歉意吧。

3. 至于“政客技术学”的问题，曙光号好歹定义了一番政客技术学的具体内涵，但我看不出张的哪句话说：法西斯不用担心那些问题，革命党可以无视条件了？这完全是在打稻草人。最后，关于“盲目乐观”，政资研根本没说你们分析法西斯的弱点是盲目的，是错的。盲目的是：法西斯有弱点，不代表他不可怕，因为工人的组织力量会被严重削弱，即使法西斯崩溃，也没力量自己夺取政权（赤旗同志也说，蒋介石法西斯根本不够格），除非社会主义国家驻军。对于革命进程来说，这完全是拖长了时间，增加了牺牲，谁不愿意革命的牺牲更小呢？更何况，法西斯发起疯来，倒退回前现代都有可能，这不可怕？怕法西斯不是怕与他斗争，而是怕人类再次受到巨大的伤害，这恰恰意味着要全力阻止他上台，即使上台了，也要全力让他下台，这其中当然要利用你们所说的法西斯弱点。不知道这样说得够不够清楚，不管怎么说吧，你们的许多文章、观点我都很赞同，就是有这些不同意见，请你们考虑下吧！

4. 仔细看了你们当时的反驳，又看了看文献，有必要补充、修正一下：首先，张的文章提出，经济利益有时不是决定立场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可能就是意识形态。我的理解是：他说的经济利益可能是指根本上的阶级利益，垄断资本掌权，小资的经济利益当然是受损最大的，虽然眼前有些小恩小惠；也可能，他就是指眼前的、现实的经济利益受损。毕竟，许多文献都指出：小资的经济利益确实受损了。首先，小业主在小资中仍然很重要。据张继平 1985 年《历史研究》上的论文，以柏林东部的冲锋队为例，小工匠、小商人等占 60%，官吏、自由职业者 30%。即使双方各占一半，我们也不能说“真正发挥作用的”只有官吏职员。其次，拿人均 GDP 推断官吏工资毫无根据，谁都知道 GDP 未必是劳动报酬。而据张继平的论文，靠薪金生活的小资，实际工资也大幅下降。再次，军备扩充吸收

了多少失业者？有多少是被征兵？他们的收入有何变化？这些直接的事实根本不清楚。另外，当兵有饭吃，然而要送死，这压根算不上什么“物质利益”。那些后方军事技术人员、官吏的扩充规模能有多大？

5. 至于工人的状况，拿食品产量的增加论证工人消费的增加根本就不成立。德国的食品很大一部分依赖进口，产量的增加主要是为了实现自给自足。至于实际工资的状况，项洋的硕士论文认为在纳粹德国的初期是平稳的。在备战时期，因为劳动力紧缺，工人的工资也上涨了（尽管物价也会涨）。这或许算是工人获得的好处吧。但论文也提到，工人在工资与工时的决定上完全失去了话语权；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下降了，利润收入的比重则上升了。工人即使获得了稳定收入带来的好处，也很难说获得了资本家的妥协“割肉”。

6. 我一开始说的“所谓减少失业实质是半军事强制劳动，工人实际工资降低”，是那篇论文的归纳，但现在感觉说的太绝对，首先，强制劳动确实有，但减少失业也并不是全靠这个，其次，这篇论文的工资数据是 1932-35，然而按项洋的论文，比较 32-36，工资就是平稳的了。所以，可以说失业者（失业工人、破产小资）和在岗工人至少获得了稳定收入，这确实可以算短期的经济利益。不过，对于小资的经济状况，我认为主要还是受损的，小业主肯定受损了，但他们依然支持纳粹，这本身已足以说明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没有文献说职员、官吏的收入增加，反而张继平的论文称下降了；我推测职员工资下降主要是因为工资赶不上物价，36年后纳粹大举扩大军事生产，物价难免上涨，工人可以加班加点挣工资，职员是非生产性的，未必有这机会；我查了普兰查斯的原书 p264，也与我推测一致，职员工资下降了 20%，同时工人工资则是稳定的；另外，也没有依据说，纳粹组织的扩展提高了成员收入。

（原载《红旗太平洋》2017年4月8日）

## 从纳粹德国的“经济奇迹”

### 看法西斯主义挽救不了资本主义

#### “鱼雷快艇海鹰号”

《红旗太平洋》撰稿人“装甲巡洋舰曙光号”就历史上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并结合东亚现实阶级斗争发表了数篇文章以后，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已经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这些文章中，“曙光号”批判了张跃然先生关于意识形态因素是促成法西斯主义崛起主要原因的错误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用当时德国各阶级具体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状况，合理地说明了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历史条件。“曙光号”认为，法西斯主义“不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也不是“天上神物”，而是特定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时代为暂时克服资本主义危机而形成的统治方式，是可分析、可认识，也是可打倒、可消灭的。“猎潜艇271号”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了一部分左派同志夸大法西斯主义危险、看不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力量的错误，指出历史上的法西斯主义不仅没有阻挡世界人民前进，而且，通过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世界范围还一度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大发展的形势。“曙光号”进一步指出，与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相比，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阶级斗争的特点已经发生变化，目前总的趋势，不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被动防御，而是无产阶级力量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下降。

近日，郑梓岩同志给红旗太平洋编辑部来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来信中，郑梓岩同志对“曙光号”介绍的若干德国经济史实提出质疑：“张（跃然）引用的著作是英文，我不方便查阅，稍做了中文文献检索，查到1985年6期《世界历史》许琳菲等人论文，指出所谓减少失业实质是半军事强制劳动，工人实际工资降低，中小企业税负增加，通货膨胀使持有国债的小资受到剥夺，大量小企业受垄断资本吞并，我认为张跃然同志的分析没有错误。... 据张继平1985年《历史研究》上的论文... 靠薪金生活的小资，实际工资也大幅下降。”（这封来信，激流网以“面对法西斯，决不可掉以轻心！”为题做了转载）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纳粹党是否仅仅靠着法西斯主义的宣传煽动就得以裹挟大批德国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放弃自己的“阶级利益”，还是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一方面部分地克服了资本主义危机，另一方面通过向德国的各劳动阶级提供一定物质利益而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当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一方面对外侵略、一方面对内迫害共产党人和犹太人等，给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对此，赤旗、曙光号等已经另有分析）。

本文结合国外关于德国现代经济史的统计资料，试图澄清在纳粹党上台前后德国经济的若干发展趋势，并进一步说明法西斯主义得以上台并一度得到巩固的历史条件。

### 纳粹德国的“经济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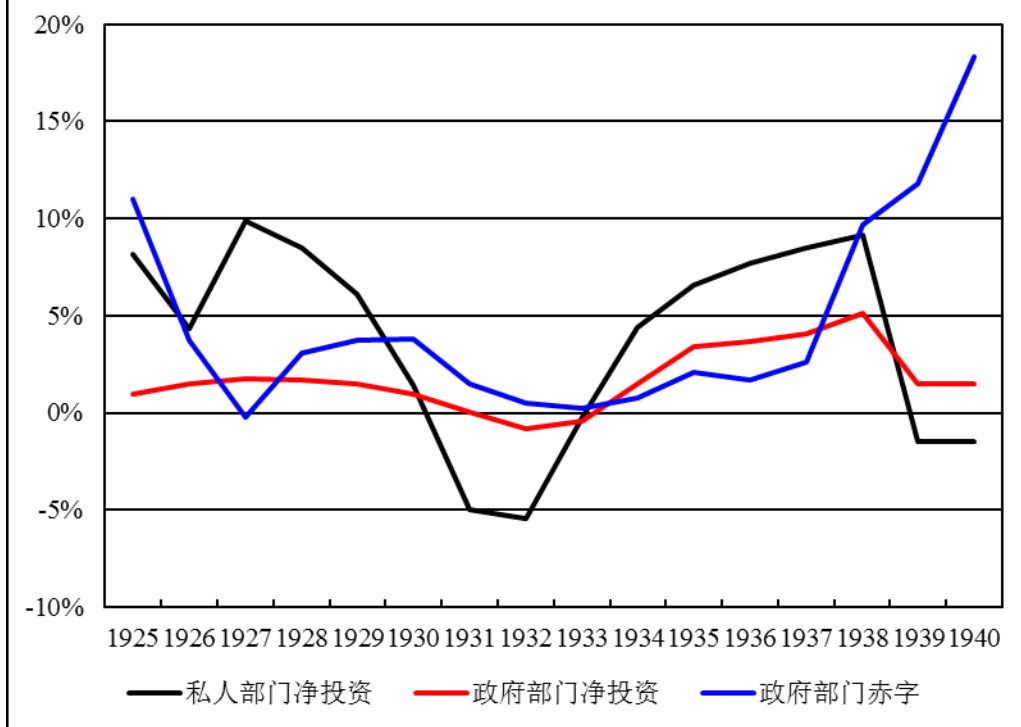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利润，资本积累的基本动力是追求较高的且稳定的利润率。利润率在一定条件下趋于下降，是造成资本积累危机的基本原因。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不同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是迄今为止世界资本主义遭遇过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在没有全面国家干预、接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次典型的经济危机。

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的私人投资高度不稳定，一旦投资波动，即可能引起投资、消费连锁反应，进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崩溃。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危机是由于总需求严重不足引起的，暂时克服危机的办法也比较简单。只要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克服个别资本家集团的反对，果断地、大幅度地增加政府开支，经济就能够很快得到恢复。在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纳粹德国最早主动实行了赤字财政政策，因而经济恢复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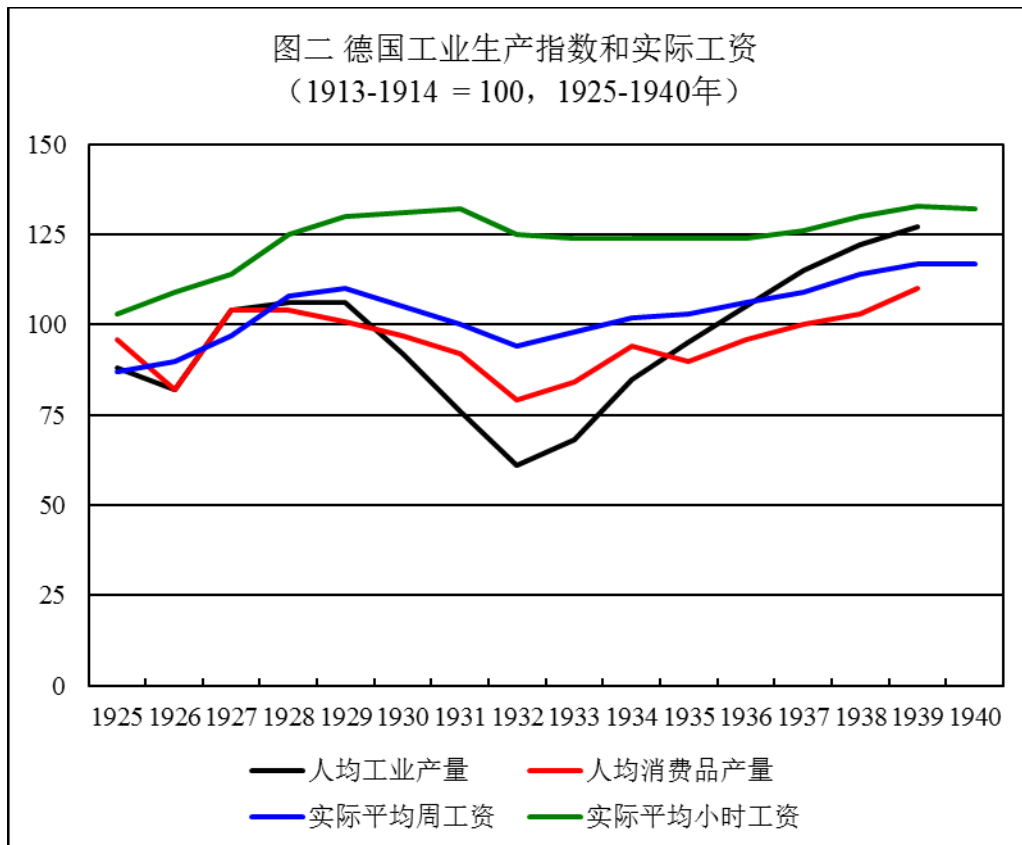
图一说明了大萧条期间德国私人投资崩溃的情况以及纳粹德国的赤字财政政策。图二说明了大萧条期间德国工业生产崩溃以及随后迅速复苏的情况。

图一 德国经济的投资和政府赤字  
(占国民收入%, 1925-1940年)



数据来源：Thomas Piketty, “PIKETTY-ZUCMAN WEALTH-INCOME DATA SET,” Germany 1870-2010, Table DE.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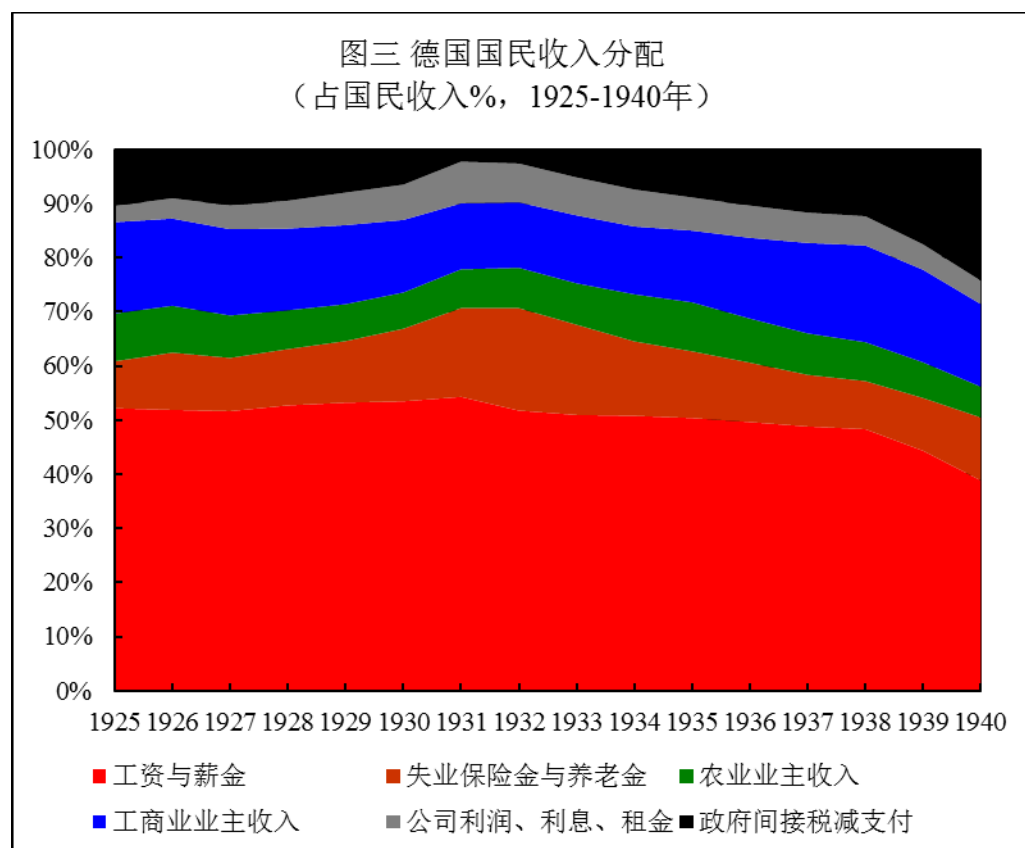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Gerhard Bry, *Wages in Germany: 1871-1945*, p.362, Table A-13, Part II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由于纳粹政府实行军备扩张和赤字财政政策,同时投资基础设施,进而刺激了消费品生产,德国经济在1932年以后迅速复苏。1939年与1932年相比,人均工业产量增加了108%,人均消费品产量增加了39%,工人的实际周平均工资增加了24%;官方失业人数从1932年的520万减少到1939年的12万。周平均工资增加主要是来自于工人劳动小时数增加,1932年至1939年,制造业工人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由41.5小时增加到47小时;但是实际平均小时工资在1937年以后也有所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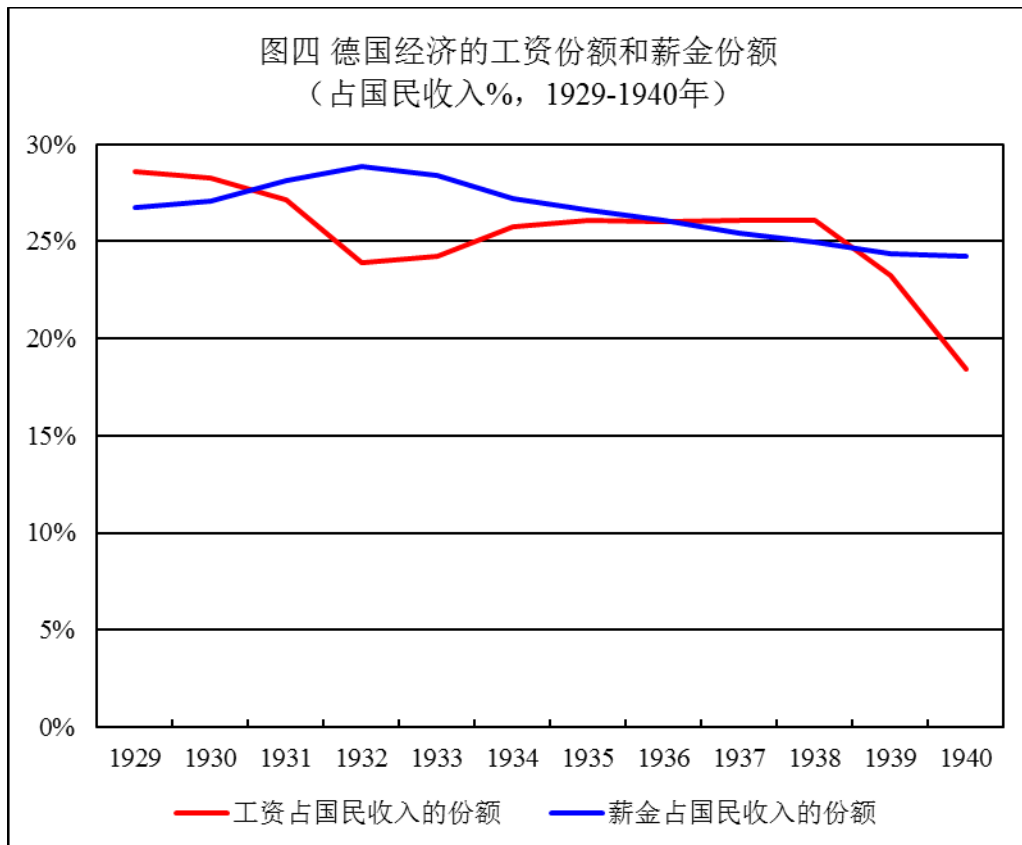
至战争爆发前的1938年,纳粹德国一度实现了大炮和黄油并举、接近“充分就业”的所谓“经济奇迹”。

## 昙花一现的“劳资两利”

图三说明了 1925 年至 1940 年德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情况。图四说明了 1929 年至 1940 年工资总额和薪金总额分别占德国国民收入的比例。



数据来源：工资与薪金、失业保险金与养老金、业主收入、租金、公司红利和利息等，见 Gerhard Bry, *Wages in Germany: 1871-1945*, p.122, Table 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笔者对“公司红利和利息”稍做调整得到“公司利润和利息”。1925 年至 1940 年的德国国民收入，见 Thomas Piketty, “PIKETTY-ZUCMAN WEALTH-INCOME DATA SET,” Germany 1870-2010, Table DE.1。



数据来源：工资总额和薪金总额，见 Gerhard Bry, *Wages in Germany: 1871-1945*, p.123, Table 3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32年，德国经济陷入大萧条的谷底。当年，工资和薪金总额占德国国民收入的52%，由政府支付的失业保险金和养老金高达国民收入的19%；后者当然不是说明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的仁慈，而是表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濒于全面崩溃，无法通过资本积累维持正常的劳动力再生产。农业业主收入（即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7%；工商业业主收入（包括一些中小资本家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12%，公司利润、利息、租金等大资本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7%。扣除转移支付以后的政府税收仅占国民收入的3%，反映了深刻的经济危机。

至1938年，由于官方失业人口大幅度减少，失业保险金和养老金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9%。工资和薪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47%，农业业主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保持在7%，工商业业主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增加到了17%，公司利润、利息、

租金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下降到了 5%。另外，扣除转移支付以后的政府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增加到了 14%。

从这些数据看，除了纳粹政府集中了大量国民经济剩余进行战争准备以外，这一时期纳粹经济政策的主要受益者是一部分中小资本家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大资本家占国民收入份额有所减少。

如果分别考察工资总额和薪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有一些有趣的发现。这个时期，工薪总额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全部集中在薪金总额。薪金总额主要是职员和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收入，而工资总额主要是生产性工人的工资收入。1932 年至 1938 年，薪金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 28% 下降到 21%；工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从 24% 上升到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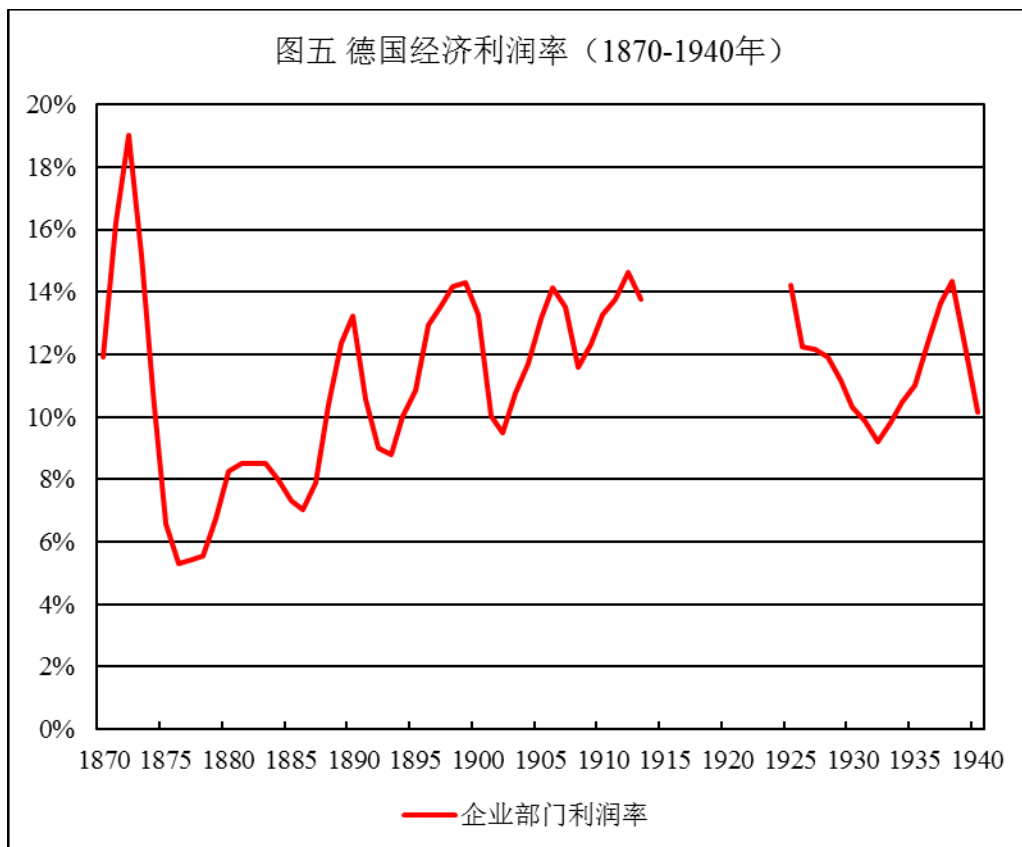
在 1939 年以前，德国资产阶级是纳粹统治的主要受益者。但是，由于大萧条造成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就使得纳粹政府有可能在一个时期内，通过赤字开支和军备投资不仅满足资产阶级增加利润的要求，而且大幅度增加就业、提高实际工资，并使得生产性工人的工资份额略有提高。

纳粹德国的这些“经济成就”当然不能解决德国资本主义面临的深刻内在矛盾，因而注定是短命的。

## 法西斯主义挽救不了德国资本主义

“法西斯主义”这一词汇虽然发端于意大利（源于古罗马的“权杖”），但是一般人们还是认为，纳粹德国是法西斯主义最典型的代表。面对大萧条和国内阶级矛盾急剧尖锐化的局面，德国资产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要在短期内恢复利润率和正常的资本积累。通过其“军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纳粹德国至 1938 年基本上实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一短期愿望。

图五介绍了德国企业部门利润率自 1870 年至 1940 年的长期变化。



数据来源：1870-1913年的德国工业部门利润率来自 Carsten Burhop and Guntram B. Wolff, “A Compromise Estimate of German Net National Product, 1850-1913,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5(3): 613-657 (September 2005), Appendix Table 3；原文中的利润率为税后利润率，笔者将其调整为税前利润率以和 1925-1940 年的数据大致相当。1925-1940 年的利润率用德国企业部门总利润除以企业部门总资产而获得，企业部门总利润为公司利润、利息、租金和工商业业主收入之和，企业部门总资产为德国私人财富总额减去土地和住房资产。德国私人财富总额来自 Thomas Piketty, “PIKETTY-ZUCMAN WEALTH-INCOME DATA SET,” Germany 1870-2010, Table DE.1；用私人财富总额乘以 60%即可粗估企业部门总资产。

在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大萧条”中（十九世纪末的人们将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和停滞也称之为“大萧条”），德国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曾经下降到 8% 以下。此后，在经济较为繁荣的 1898-1899 年、1906 年、1912 年，德国企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都在 14% 以上。

在经历了二十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以后，德国经济在 1925 年以后出现了相对繁荣。1932 年，德国企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暴跌到了 9%。经过纳粹党数年统治以后，至 1938 年，德国企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恢复到了以往经济繁荣时期才有的 14% 以上。

但是，到了 1938 年，德国经济已经全面复苏，闲置生产能力已经充分动员，纳粹政府的经济红利也已经消耗殆尽。随着官方失业率下降到接近于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纳粹德国很难长期维持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而不引起工资上涨的巨大压力。一旦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形成浪潮，纳粹德国就无法同时满足资本家资本积累的要求以及工人阶级对就业、工资的要求，其表面上“广泛”的社会基础也就会迅速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原材料较为短缺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国，纳粹德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无法完全依靠自由贸易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原材料。

从客观条件来说，德国具备相当的军事和工业实力，在欧洲大陆上拥有陆军的优势，有着征服法国乃至打垮苏联的一定可能性。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纳粹德国终于走上了毁灭和死亡的道路。

## 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条件

法西斯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为了挽救自身统治、恢复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统治方式，除了纳粹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和日本以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西斯主义又有各式各样的变种（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智利的皮诺切特政权等），其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又有差别。至于与法西斯主义有某些相似性的军事独裁政权或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则更是不一而足。

问题在于，今天我们讨论法西斯主义问题，对于东方的现实阶级斗争有着怎样的意义。

郑梓岩同志提出：“法西斯有弱点，不代表他不可怕，因为工人的组织力量会被严重削弱，即使法西斯崩溃，也没力量自己夺取政权 ... 对于革命进程来说，这完全是拖长了时间，增加了牺牲，谁不愿意革命的牺牲更小呢？更何况，法西斯发起疯来，倒退回前现代都有可能，这不可怕？怕法西斯不是怕与他斗争，而是怕人类再次受到巨大的伤害，

这恰恰意味着要全力阻止他上台，即使上台了，也要全力让他下台，这其中当然要利用你们所说的法西斯弱点。”

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任何牺牲，只要能避免，就应当努力去避免。比如，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就是应当并且可以避免的。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总的来看，一般来说，没有代价的进步是没有的，尤其是劳动人民反抗剥削者压迫者的斗争，总是要遭到剥削者和压迫者疯狂的反扑和镇压，乞望反动派不拿起屠刀，而是听任进步群众和平地、民主地、不流血地“搞革命”，那是不现实的。一个进步青年，对于这样的斗争，要有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

历史不容假设。我们当然不能断言，德国法西斯主义绝对不可避免。但是，从当时德国实际的历史条件来说，这是不容易的。早在 1914 年，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主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已经走上了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不归路。赤旗同志曾经指出，德国工人不应该“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子继承权”。列宁是用这句俄国谚语指出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二十世纪的现实却是，德国工人阶级实际上选择了另外一种“长子继承权”，那就是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是有资格靠着参与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几十亿人民来当“工人贵族”的。这难道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吗？这种物质利益在德国工人阶级默许乃至纵容希特勒上台的过程中难道不是起了巨大作用吗？这种物质利益，难道靠着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就可以让德国工人视而不见吗？

在历史的实际发展中，虽然德国资产阶级因为战败而失去了在世界上争霸的资格，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被美帝国主义招安以后坐稳了核心国家的地位，德国工人阶级也一度过上了“黄金时代”的好日子。即使在新自由主义猖獗的今天，大多数德国工人仍然在怀念着改良主义的迷梦，不能够完全放下“工人贵族”的架子。反映在政治上，君不见，号称“和平主义”的绿党也好、号称“激进”的左翼党也好，在不同时期都曾经支持过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这就是历史的现实。尊重这样的现实，才是唯物主义，否则，便是唯心主义。

好在，德国早已经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二十世纪曾经有一种说法，叫做世界革命中心不断东移。未来世界革命的中心，仍将在东方。

在东方，资产阶级所面临的无产阶级，已经不亚于当年德国的无产阶级；而东方的无产阶级，却既不掌握在短期内实现昙花一现劳资两利的便利，也没有在远期如德、日般被招安进而维持数亿工人贵族的经济资源和历史命运。

一战定天下？那是只有“小粉红”才将其认真对待的儿戏。可惜的是，一些“马列主义者”却乐得以“小粉红”的见识为自己的见识，以“小粉红”的历史常识为自己的历史常识，以“小粉红”的愿景来代替资本主义腐烂瓦解的现实。

法西斯主义在东方卷土重来？用郑梓岩同志自己的话说：“蒋介石根本不够格”。



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不要害怕法西斯？

“装甲巡洋舰曙光号”

近日收到一位署名“郑梓岩”的同志对“红旗太平洋”发表的《同志，咱们聊聊怎么给资本主义挖坟》一文的评论。在此，我们感谢郑梓岩同志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就其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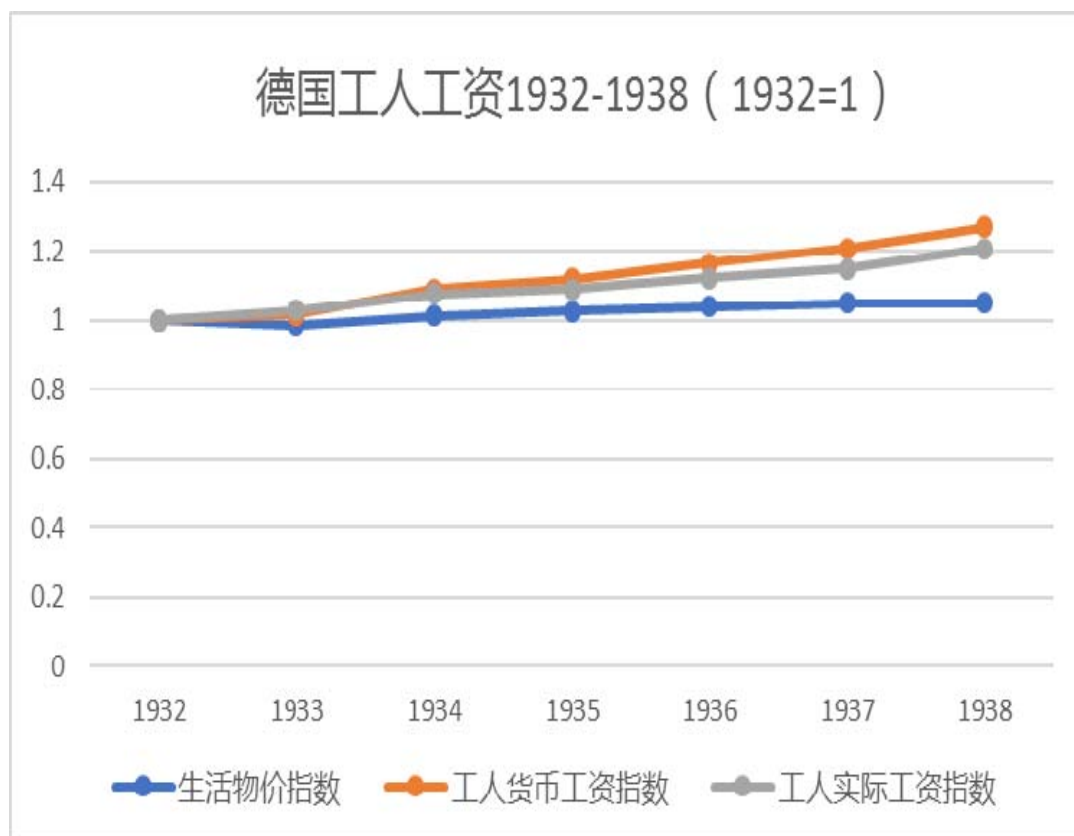
郑梓岩同志的回复大体可以总结为三个问题：1、德国各阶级的生活水平在纳粹上台直到战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2、我们对张跃然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兴起》一文是否存在着乱扣帽子的情况；3、法西斯究竟可不可怕？针对其中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讨论一下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历史统计，以及面对与自己切身经验不符的统计资料时应当怎么入手的问题。针对第二个问题，我们想要讨论对事物的合理归纳和扣帽子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让诸多深陷于此的进步人士伤透脑筋的问题。针对第三个问题，我们想谈谈毛泽东同志“大破与大立”的历史辩证法。

### 一、从资产阶级统计数据看战前德国阶级关系

郑梓岩同志引用了许琳菲等人的论文《希特勒的上台与德国法西斯专政的本质》一文，指出 1、工人实际工资降低，；2、所谓减少失业的实质是半军事强制劳动。除此之外，许琳菲等人的论文在同一段中还指出了 3、将妇女排挤出就业市场从而人为压低失业率的问题，这与赤旗同志的文章相关，我们在此一并回复。

许琳菲等人指出的工人实际工资降低的原话是“工人的周工资在 1932 年第四季度是 22.6 马克，在 1935 年第二季度是 23.81 马克，或者说工资增长了 6.9%，而同时期食品价格上涨了 13%”可惜的是，许琳菲的文章里并没有指出这些数据是哪里来的，因而我们无法查到原始数据来纠正我们可能的错误（如果我们出错的话）。另一方面，许琳菲等人的数据

只反映了 1932 年和 1935 年不同季度的两个时间点的情况，并不能说明纳粹上台直到战前整体实际工资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合理的估算当时德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呢？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提供的战前德国生活费用物价指数与工人的货币工资指数，我们可以计算出当时德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化，图表如下：



图：德国工人工资状况

上图反映了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6 年间，生活物价指数上涨了约 5.1%，平均每年上涨 0.8%。0.8% 的年生活物价指数上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并没有出现许琳菲论文和郑梓岩同志回复中所描述的剥夺型的通货膨胀，而这个通胀水平要比中国近 10 年的水平低得多。纳粹党相当清楚正是德国在二十年代初的恶性通货膨胀造就了作为在野党的纳粹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到了纳粹党成为执政党时，它当然不希望同样的事情造成民众的严重不满，而再次把自己踢下台。比较实际工资我们可以看见，从 1932 到 1938 年间工人实际工资上涨了约 21%，并没有出现郑梓岩同志所认为的实际工资下降的情况。

第二，关于所谓“半军事强制劳动”的问题。很不幸的，许琳菲等人又未给出这一论断的出处，也并未在前后给出战前曾存在对整个工人阶级大规模强制劳动的证据。只是在后面提了一句“是对工人阶级实行加紧控制和向军事经济过度的措施。”我们知道，军事工业生产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对工人进行“半军事化强制劳动”，因为劳动的性质主要由所有制和分工结构而不是行业决定。战前德国有没有强制劳动？有，在集中营里，这个我们上一篇文章已经论述过。但是集中营的极少量强制劳动（对整个经济而言）与整个阶级的强制劳动显然不是一回事。所以，就连郑梓岩同志自己也说许琳菲等人的论断“感觉说的太绝对”。简单地说，强制劳动属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手段，这意味着在提高劳动时间的情况下，降低小时工资，以达到增加剥削率的效果。但是，根据《德国的工资》提供的历史资料计算，德国工人 1932 年到 1938 年间小时名义工资率上涨约 8%，扣除上文计算的 5.1% 的生活物价指数，小时实际工资上涨约 2.8%。从上涨的小时实际工资来看，战前纳粹德国恐怕并不存在整个国民经济意义上的大规模强制劳动。

第三是关于妇女与就业市场的。赤旗同志和许琳菲等人都提出了纳粹德国有计划的排挤妇女就业来为男性创造岗位，让女性重归家庭。不过纳粹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实际的状况又是另一回事。根据《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相关数据计算，在 1933 年到 1939 年间，德国男性经济活动人口增长约 4.8%（武装部队服役人口也计算在内），女性经济活动人口增长了约 11.2%，女性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反而增加了。这也反映了法西斯政权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打压女性，想要把她们赶回家庭，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女性解放的斗争面前，纳粹也不得不接受女性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现实。综上所述，工人阶级是得到好处的。

然后是关于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分成两部分说。首先是现代小资产阶级，即以职员和官吏等为代表的，能够支配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且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郑梓岩同志引用普兰查斯的书认为，战前德国现代小资的工资下降了 20%。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重要论

断，普兰查斯却没有在后面注明出处，只是一个数据摆在那里。但我们的研究却不能止步于无言，我们必须寻找可靠的历史资料去说明现代小资的状况。普兰查斯在同一页上给出了现代小资两个部分占人口的比例（这倒是给出了较为可靠的出处）。根据普兰查斯引述的数据，白领工人和公务员（这两者是现代小资的绝对主力）在 1933 年占总人口的 18.4%，在 1939 年占总人口的 20.4%。按照这两年的德国人口普查资料，这意味着 1933 年德国拥有现代小资约 1215 万人，1939 年则为 1417 万人。根据《德国的工资》一书第 123 页引述的《经济与统计》上的资料，现代小资的名义薪金总额从 1933 年到 1939 年 136 亿马克上涨到 209 亿马克。根据物价指数扣除价格因素（约 9%），1933 到 1939 年德国现代小资实际薪金上涨约 12%。当然，我们不知道已经逝世的普兰查斯如何处理他的数据，因而难以探讨他具体得出“下降 20%”这一结论的具体过程，但是，现有证据很可能与其结论相左。所以，现代小资产阶级是得到好处的。

再是关于传统小资，即占有有一定生产资料并自己参加劳动的小业主阶级。根据《德国的工资》一书，小业主收入 1933 年到 1939 年从 103 亿马克增加到 258 亿马克。而关于小业主的人数，普兰查斯没有给出明确的数字，但是他明确提到了（这也被郑梓岩同志引述的几篇中文文献所证实）：小业主作为一个阶级的数量在减少。那么，我们就假设小业主阶级的数量不变，那么小业主阶层的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收入则上涨了 130%。即，如果要让小业主实际收入下降，小业主的数量在 1933 年到 1939 年间至少要增加 130% 才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传统小资产阶级是得到好处的。

那资本家呢？根据迈拓（Maito）的文章，纳粹德国的利润率从 1930-34 年的 5.4% 上升到了 1935-39 年的 13.5%。无独有偶，根据《纳粹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张图表，我们也能看到资本回报率率的上升。所以，资产阶级也是得到好处的。

## PARTNERS: THE REGIME AND GERMAN BUS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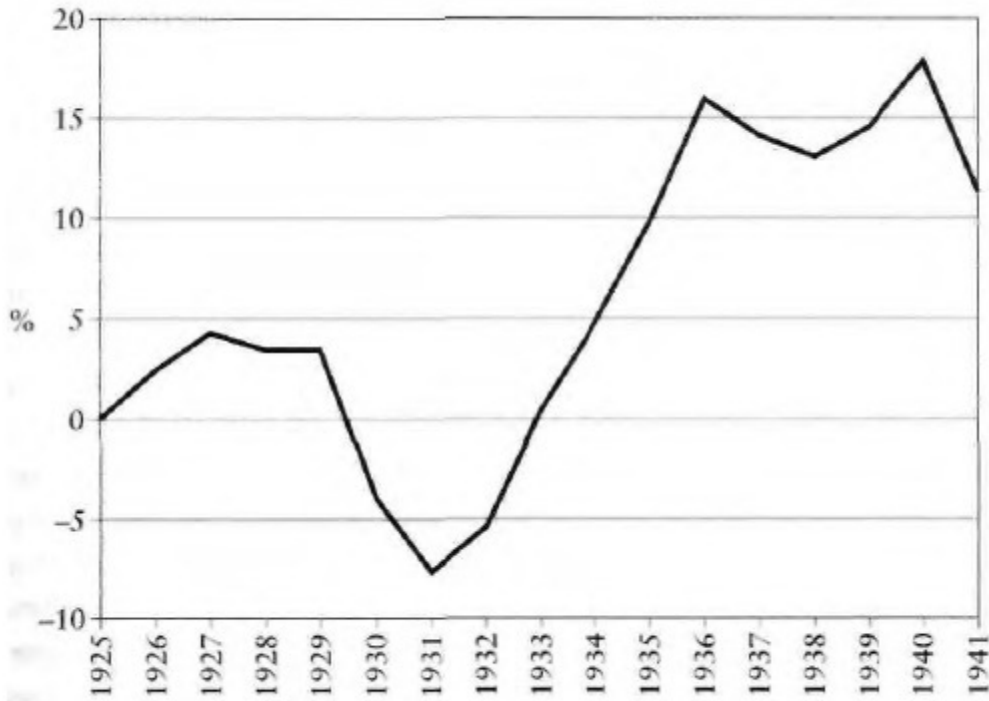


Figure 6.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 in German industry, 1925-1941

综上所述，战前德国工人、小资产阶级的实际工资、薪金、业主收入是上升的，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率也是上升的，社会三大主要阶级在纳粹上台到战前都得到了好处。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凯恩斯主义国民分配理论的解释，能够维持实际工资和利润率同时上涨的情况，是以产出资本率的提高，即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为条件的。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是由于闲置的劳动力和闲置的资本再次结合，出现了资本生产率大幅度上涨。用简单的分蛋糕的比喻，就是蛋糕做的大了，资本家和工人和小资分的都比以前多了，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共赢”。当然，正如“鱼雷快艇海鹰号”所讲的，这种“共赢”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在此不再赘述。

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纳粹党之所以能够上台和保住政权，是因为它至少暂时地解决了当时德国资本主义最突出的矛盾，即积累危机和阶级冲突。从根本上讲，正是因为战前纳粹党执政期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的调整

释放了原先被束缚的生产力，因而暂时地挽救了资本主义。

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问题。劳动收入份额是我们前一篇文章论述利润挤压理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劳动收入份额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从长期来讲，是阶级斗争实力对比的晴雨表。郑梓岩同志引述向洋的硕士论文，指出纳粹德国战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关于这个问题，根据不同的统计资料计算的数字是不一样的（鱼雷快艇海鹰号也探讨了这一问题）。但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般趋势来讲，在二战以前，危机最深重的时期往往是劳动收入份额最高的时期，相对的，即利润份额最低的时期。这是因为利润对整体经济形势的反应更加灵敏，而劳动收入的反应则相对迟缓。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这叫“劳动市场缺乏弹性”；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来说，这叫“工资粘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这是工人和部分现代小资进行反失业、反减薪斗争的成果。战前德国利润份额的增长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跌，是经济复苏后利润恢复性增长的结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实行罗斯福新政，大搞社会保险，建设以“劳资妥协”为旗号的“大政府资本主义”的美国。这并不能说明德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从长期看，第三帝国时期（1932-1938年）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以薪金和工资总额计算，约为57%，根据Jostock的测算结果），就比第二帝国时期（1895-1913年）高很多（约43%）。所以，从国民收入分配看，纳粹党执政的和平时期，并没有出现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大规模溃败的状况。

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否认第三帝国是资产阶级政权，任何否认这一事实的行为都是为法西斯主义张目。但是，光从情绪上反对法西斯，将法西斯上台和一定时期内保住政权都说成是“欺骗”，显然是忽视了法西斯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将法西斯当成了不可分析的东西。具体的讲，我们也不能否认即使在如此艰难局面下，德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取得了实际工资、薪金、小业主收入上涨的成果，而且，德国劳动收入份额上涨的长期趋势，也并没有因为纳粹党上台而被打断。这是德国工人阶级在困境中英勇斗争的成果，是不可能用工人阶级因为“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而受到法西斯的诱骗一笔勾销的。

以上就是我们对郑梓岩同志关于战前德国各阶级状况的回复，同时感谢“鱼雷快艇海鹰号”同志提供的重要数据资料。郑梓岩同志相当认真地寻找证据支持自己的结论，这一点是令人钦佩的。在此，我想多谈一些关于进步人士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历史统计的问题，这个讨论并非针对郑梓岩同志提出的问题，而是针对许多进步人士在从事进步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资产阶级历史统计的客观性，因为资产阶级历史统计往往担负着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决策提供依据的职能。它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进步事业服务，马克思和列宁都是辩证地使用资产阶级统计资料的大家。我们不能因为资产阶级统计数据本身复杂繁多，又都挂着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术语，就一概地把它们都称为资产阶级糊弄民众的把戏。其实，资产阶级并不总是愚蠢的，在重重意识形态掩盖下的某些实际指标的变动，反映了资产阶级对自己社会矛盾的认识，其中某些认识也是部分符合客观现实的。例如，去年一些自由派经济学家就提出两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一个是中国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很低，还有继续下跌的趋势，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赶不上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他们提出要反思、修改、乃至废除《劳动合同法》。

我们必须谴责资产阶级“狗头军师”们想要打击工人的险恶用心，不过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他们的表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首先，简单地说，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古典经济学用于解释一切不是由劳动和资本投入引起的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进步、组织、世界市场波动和阶级斗争等。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正，就意味着劳资两大阶级按照自己的边际生产率分配过收入之后还有富余，这一富余给工人就是实际工资上涨，给资本家就是利润率上涨。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同志曾形象地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看作是劳资妥协的空间，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高时，劳资妥协的空间就大，资本主义积累秩序就可能相对平稳。反之，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很低甚至为负的时候，劳资妥协的空间就被急剧压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发生的概率和烈度就会上升。从东亚的现

状看，根据统计局的资料计算，新世纪以来实际工资一直在上升而 2008 年以后的利润率开始急剧下降。这说明近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带来的劳资妥协的少许富余很可能大部分给了工人，这也是为什么这几个“狗头军师”们呜呼哀哉的原因。而关于实际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问题，用分蛋糕的简单比喻，就是工人分得的蛋糕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整个蛋糕的增长速度，所以工人分得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大，资本家分得的蛋糕比例越来越小。这也被我们上一边文章举出的工资份额的趋势所证实。所以，这几个狗头军师的表述并非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嚣张喊话，根本上讲，这是阶级斗争中已现颓势的资产阶级策划的一场舆论反攻而已。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体经验与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别问题，“鱼雷快艇海鹰号”同志已经在《逛店发现，马克思又错了？》一文中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就不在此赘述。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相信资产阶级统计数据，更不能在搞不清数据意义的情况下胡乱使用。有兴趣的进步人士应该了解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统计学，识破伪科学部分，并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解其中能够反映现实的成分，从而使资产阶级统计数据为我所用。

## 二、 归纳总结与扣帽子——进步人士如何正确对待讨论中的分歧

郑梓岩同志在回复中认为我们“没有根据”地给张跃然先生“扣帽子”。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许多进步人士在论战时经常遇到这样的状况。一般地讲，我们在参与任何讨论时都需要对自己或对方的观点做一个基本的归纳，对部分特别重要的部分往往需要给出定性，这是我们总结上一阶段讨论成果，开启更深入讨论的必由之路，这无可厚非。例如郑梓岩同志自己就认为曙光号“唯我独革”。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郑梓岩同志在扣曙光号的帽子，因为“唯我独革”很可能是郑梓岩同志根据自己的理论学习和经验总结对曙光号某些行为的归纳。

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给张跃然先生扣帽子呢？这要分成两个问题回答。



第一个问题，我们说的“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和“政客技术学”是在指张跃然先生个人吗？我们在提到上述两个词的时候，指的都是张跃然先生的文章，而非个人。我们也没有将郑梓岩同志负责的“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当成新自由主义的旗手。我们从未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情况下给张跃然本人下过什么结论，从未抽象地说过张跃然本人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但是他在文章中却不加批判地使用了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

第二个问题，张跃然的文章是怎么使用“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和“政客技术学”的？我们知道，一篇文章究竟讲了什么，并不取决于它宣称自己在讲什么，而是取决于其在论述展开过程中的立场和方法。

张跃然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如何解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宣讲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所谓“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基本上都是【经济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这些解释“将政治现象简单归因为生产力发展程度的解释框架”，这种理论“机械而缺乏美感”，且“与基本史实相悖”。因此，他引述普兰查斯的书，想要找到一种“即能守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又能去除掉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笔者注）经济决定论色彩”的理论。

那么张跃然是如何克服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缺乏美感”的“经济决定论”的呢？他选择了“将【政治】带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当中”。那如何回归“政治”呢？按照张跃然的说法，就要承认“经济利益不仅不是决定一个阶级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就要承认“阶级斗争的过程虽然被经济结构所影响，但本质上有其独立的政治逻辑”。就要承认“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的统一、而不是和经济状况的统一，才是小资产阶级作为一股独立政治力量的存在基础”。

且不说“政治”是否曾远离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需要劳烦张跃然先生号召大家带回来。如果我们要以张跃然为榜样，做一个不那么“缺乏美感”的马克思主义者，克服掉令

人不舒服的“经济决定论色彩”，就要坚持“阶级斗争”“本质”上是“独立”的；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不是由其经济关系，而是由其“意识形态倾向”所指挥的；所以经济结构在阶级政治中“某些情况下连主要因素都不是”。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要求去做，会发生什么呢？张跃然先生很有实践精神地替我们试了试水。按此要求，张跃然指出，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原因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转变“国家形态”，把“自由放任式”国家扭转为“积极干预式”国家；小资产阶级则出于对垄断资本的“羡慕嫉妒恨”和对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及坚持社会“公正”的理念自觉充当自带狗粮的帮凶；无产阶级则是由于“梦想破灭”之后的“感伤主义”，和期望大小资产阶级内斗的看戏心态而放弃了抵抗，任人宰割。其中，法西斯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本土排外主义，国家权力崇拜，对资产阶级财富积累过多的不满和对经济再分配的渴望”恰好符合了小资产阶级的“公正”观，而且填补了深陷“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泥潭的无产阶级的空虚心灵，于是在大资产阶级的操控下翻身上马，一统江山，造就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片段之一。”（本段引自我们的第二篇关于法西斯的文章《法西斯是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垄断资产阶级想要转变国家形态实现彻底的资产阶级专政，让“国家的主导权逐渐从议会向国家官僚机器转移”，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联合“中等资产阶级”（他们是官僚机器的主要阶级来源，在坚持私有制问题上也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天然盟友），打压无产阶级，而是要“攻克”“中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抵抗呢”？如果小资产阶级既对垄断资本家“羡慕嫉妒恨”，又渴望社会“公正”，那他们为什么不联合无产阶级向垄断资产阶级发动进攻，去争取喝汤吃肉，满足他们的“公正”呢？如果无产阶级因为革命失败而成了“浪漫主义”的俘虏，那他们为什么很不“浪漫”地去搞阶级合作去搞议会斗争（议会斗争可是出了名的繁琐无趣，一点也不“浪漫”），而不是“浪漫”地去跟纳粹党争抢街头政治的地盘呢？

如果我们成为了具有“美感”的马克思主义者，“拒斥生产力决定论”，让“经济结构”回归它“连主要因素都不是”的地位，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理论一切皆有可能，什么都能解释。换句话说，就是什么都不能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看待经济结构在阶级斗争中的地位的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这样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任何放弃了“经济结构”作为决定性因素的阶级理论，就同时放弃了对历史的规律性的解释，放弃了人的认识是可以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放弃了人们可以在正确认识规律的情况下用符合规律的实践改造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拒斥”了“经济决定论”的、具有“美感”的阶级理论看来，只要法西斯主义给工人“充分嫁接上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元素”，就能把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工人争取过来，从而取得和长期保有政权，同时工人和小资也会高高兴兴得磕着廉价的精神鸦片而乐于去干这种被卖了还替人数钱的事情。反之，社会主义政党只要不“眼睁睁地看着法西斯政党的崛起”，不去搞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伎俩，就能避免自己被“一纸禁令解散”的倒霉事（关于社会主义政党在当时可能的历史选择空间，参见“鱼雷快艇海鹰号”的最新文章）。我们从来没有否认意识形态战场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但是在张跃然提供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这些锦囊妙计中，我们没有看到不以人的意识形态为转移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如何决定了意识形态战场的深度广度，如何决定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手段与方式。阶级斗争被理解为了意识形态战场上宣传与反宣传、欺骗与反欺骗的扳手腕，而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矛盾的结果。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是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中拉拢选民的“政客技术学”。

最早一批将马克思主义冠以种种“决定论”帽子（这确实是扣帽子）的，是新自由主义历史理论的先驱波普尔。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两部书中这样指责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规律性的承认和探讨，以及从经济基础分析规律性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为了“极权主义”张目。简单地说，波普尔看来，

马克思主义对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的探索是对归属感的需求（波普尔倒是意识形态独立性的真诚粉丝），这种归属感会导致对国家、民族和领袖等的盲目崇拜，因为国家、民族、领袖等只不过是归宿的具象化。所以，波普尔看来，打从娘胎里就带着极权主义胎记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自那以后，各种说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的声音就成了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这也糊弄了一部分自称“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每当要攻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点时，自由派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顶“决定论”的帽子扣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就觉得自己仿佛打倒了马克思主义。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理论界基本还停留在“甘愿做三百年殖民地”的“气功大师”阶段，阿猫阿狗都可以冒充理论家的时期非常普遍。而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攻城略地的本世纪初，一些不了解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也不理解唯物辩证法的进步青年把所谓“决定论”信以为真，简单地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以及自由派宣传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僵化”同“一根筋”的，“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了起来，这不足为怪。这一倾向的另一种表现是抬高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而贬低、割裂马克思本人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尤其是割裂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联系。曙光号自己在大学时期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曾认为马克思晚年（指1867年以后）背叛了自己青年时代蓬勃燃烧着的“历史人本主义”思想，忽视了意识形态，哲学批判和宗教批判的“独立性”，封闭了历史走向其他道路的可能，成了“经济决定论”和“线性历史观”的代表，走上了黑格爾的老路，而恩格斯则被当时的曙光号认作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罪魁祸首。后来，在学习实践和与自由派论战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学习了唯物辩证法，认识到了自己由于不了解历史和思想史而被“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蛊惑，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在张跃然的文章里，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意识地批判和甄别“经济决定论”，而几乎是对新自由主义攻击“决定论”的官话照单全收，当需要阐述历史规律时，只是模糊地承认一下“社会经济形态”等物质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到具体问题，就又变成了“羡慕嫉妒恨”，“公

正”，“浪漫主义”。这不是对唯物史观的任何“发展”，只是对其进行一番抽象的肯定和具体的否定而已。至于郑梓岩同志认为我们要和张跃然先生争个输赢，这显然完全误解了我们发文讨论的意义。正是曙光号自己也犯过错误的经历让曙光号对其他人犯有同样的错误更为敏感，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我们有义务让其他同志少走些弯路，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就事论事”地讲，我们说张跃然的文章里面不加批判地使用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官话，将阶级斗争的规律阐述成了“政客技术学”，是对文章中具体问题的正确归纳，不是给张跃然本人，更没有给“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扣帽子”。

在进步人士的日常讨论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为了避免误会，我们不能随便给别人扣帽子，也不要随便说别人给自己扣了帽子。而应当具体分析和总结自己与对方的立场、方法与结论，虚心接受正确的批评，分析和指出不当的批评。在中国革命史上，曾经的中国共产党毫不讳言自己的同志，甚至是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曾经犯过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事求是、健康坦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曾经的中国共产党保持自己优良作风的法宝。这也是我们应当向中国革命史学习的。

### 三、 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大破与大立的历史辩证法

郑梓岩同志认为我们在对待法西斯的问题上“盲目乐观”，而且具体地给出了是如何“盲目乐观”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应该赞赏。郑梓岩同志认为我们的“盲目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法西斯的行为是不可以用常理分析的，它“发起疯来，倒退回前现代都有可能”；第二，法西斯可怕，是因为它会拖长革命进程的时间，增加牺牲，“谁不愿意革命的牺牲更小呢？”，因而郑梓岩同志怕的是“人类再次受到巨大的伤害”。我们下面就来一一回答郑梓岩同志的问题。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正如我们前面论述的，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为解决自身矛盾而设

计的，当它无法解决矛盾时，无论是这种统治形式还是其代表集团都会被资产阶级抛弃。法西斯集团的个别人物可能发疯，但是法西斯的经济基础不会发疯。希特勒在战争末期确实发疯似地下达了毁灭德国一切现代工业和交通的命令，但是这一命令一出来就遭到了上至军备部长施佩尔，下至基层官兵的积极和消极抵抗，从未被认真实施。德国资产阶级没发疯，战后直接把法西斯的元帅、将军、部长和总督们扔给了纽伦堡法庭，自己继续跟从前的敌人做着生意。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确实也发疯似的叫嚣着要搞“一亿玉碎”，牺牲全体国民。但是冲绳一丢，关东军一完蛋，两颗原子弹一落下来，中国战场敌后大反攻一打响，照样乖乖地把天皇请出来“玉音放送”投降声明。意大利法西斯连发疯都没来得及就被本国资产阶级一窝端了。而遭到战争破坏的世界各国经济也基本于 1950 年左右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部分法西斯狂热分子确实可能发疯，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法西斯是资产阶级的一门生意，对待发疯的生意人，有时无产阶级还没来得及动手，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经把他们淘汰。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资产阶级替我们完成革命，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法西斯越是发疯，就越是不能适应资本积累的需要，法西斯国家资产阶级营垒内部的纷争和内耗就越激烈，就越容易从内部和外部摧毁。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类再次受到巨大伤害”所以法西斯可怕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听听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说的。在《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 年 11 月 8 日）中，毛泽东同志讲：“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

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毛泽东同志结合自己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的革命经验做出的总结。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党多少次遭到敌人背信弃义的攻击和屠杀，他们害怕了吗？中国共产党是否因为害怕国民大革命失败，增加牺牲，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就停止武装反抗？是否因为害怕会背上破坏双十协定的罪名，增加牺牲，给人民群众造成伤害，就不去消灭进犯上党地区和诸条铁路线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害怕战争，战争就不来了？害怕牺牲，就不会有牺牲？害怕法西斯，法西斯就会对我们温柔一些？

对法西斯，对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对战争的害怕，不是我们推动历史进步，推动人类解放的旗帜，反而是害怕斗争，消解斗志的降幡。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政策，不就建立在对核战争爆发后所谓“人类文明毁灭”的深深恐惧之上吗？那么，赫鲁晓夫这种“害怕”，对于苏联领导下的那一部分社会主义运动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赫鲁晓夫是把社会主义“害怕”大了，还是“害怕”强了？是把干预古巴的美国舰队“害怕”地屁滚尿流了？“戴维营精神”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害怕”强了还是“害怕”弱了？一讲到法西斯，一讲到战争，一讲到和反革命刺刀见红，一讲到可能要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继续做进步工作，一些人就害怕了。他们所害怕的，恐怕不是什么同志们的牺牲和人类文明的毁灭，而只不过是害怕打碎自己小资生活的坛坛罐罐，害怕在斗争中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害怕经历历史和人民的考验罢了。我们相信，郑梓岩同志并不是这样的人。

资本主义发展客观规律告诉我们，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方式，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对法西斯同样适用，同理，资本主义灭亡的规律法西斯也是逃不掉的。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书信中提到，人类历史的规律，是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东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崩溃，资产阶级的“天下”真的“大乱”了，法西斯或效仿法西斯的政权以各种名目上台执政，他们也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无法像纳粹德国那样撑起一个哪怕是短暂的“共赢”局面（参见本文第一部分关于“全要素生产率”与阶级妥协空

间的探讨)。他们花言巧语的欺骗，无法喂饱民族沙文主义的胃口，无法将无产阶级绑在自己的战车上。而逐渐认识到无论资本主义如何巧立名目都无法解决矛盾的人民大众，会认识到资本主义正是矛盾本身。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自为的”、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阶级斗争，打垮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打垮资产阶级的直接暴力，打垮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打垮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为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恩格斯在解读黑格尔哲学时指出：“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意思是说合乎客观规律的事物必然会克服重重阻碍成为现实。毛泽东同志和中国革命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充分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那么小的可以战胜大的，弱的可以战胜强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大乱”，正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通往“大治”要走过的中间站。这就是社会变革运动中大破与大立的历史辩证法。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恩格斯：《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1月8日）

《帕尔格雷福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

纳粹政治经济学 <https://pseudoerasmus.com/2015/05/06/fascists-part-2/>

Maito, Esteban Ezequiel. "The historical transience of capital: the downward trend in the rate of profit since XIX century." (2014).

Bry, Gerhard. Wages in Germany. Univ. Pr., 1960.

Jostock, Paul, and Charlotte Boschan. "THE LONG-TERM GROWTH OF NATIONAL INCOME IN GERMANY."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1 (1955): 79-122.